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胡适研究通讯

耿云志先生纪念专号

2024年第2期（总第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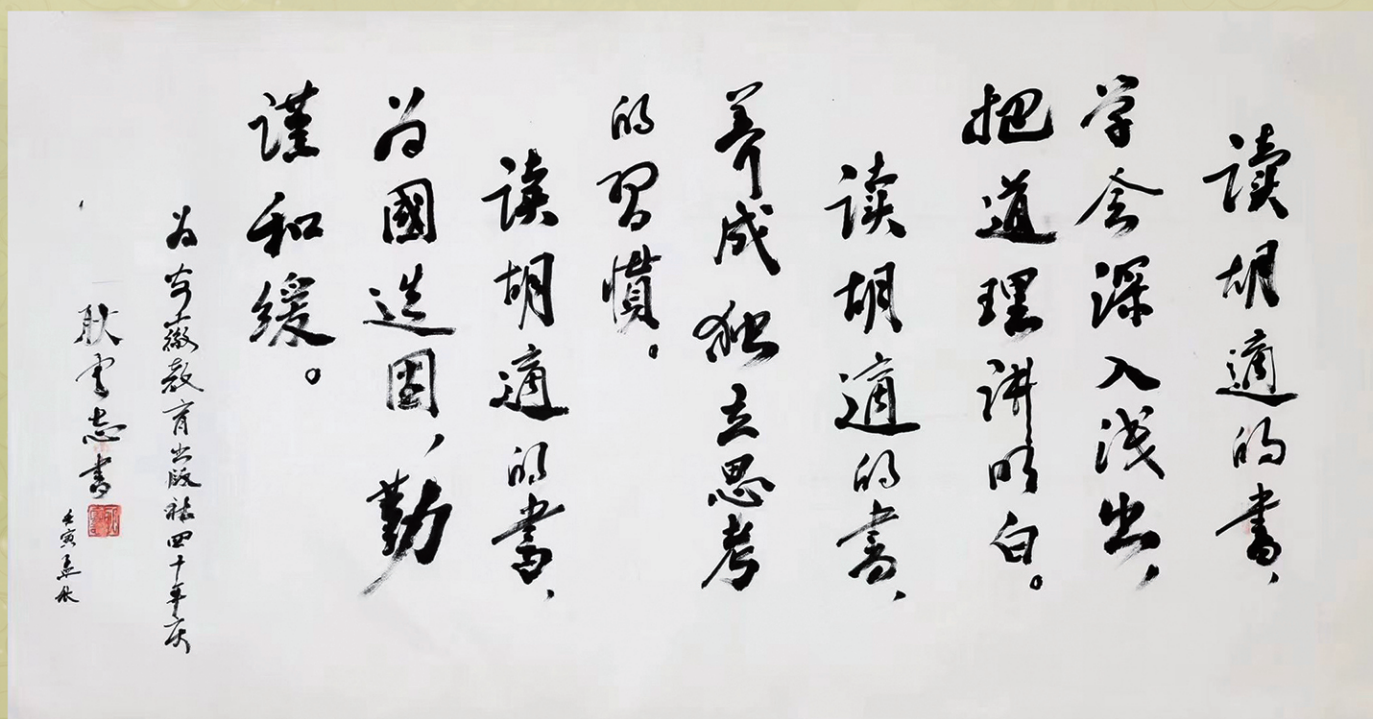


胡适研究会编 宋广波 主编

2024年8月25日



耿云志先生出席《胡适全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



耿云志先生手迹

目 录

讣告	(1)
追悼耿云志先生挽联、唁电、唁函	宋广波整理 (2)
一、挽联	(2)
二、唁电、唁函	(4)
一部年谱要有灵魂——宋广波著《胡适年谱长编》序	耿云志 (12)
《胡适留学日记（汇校本）》序	耿云志 (13)
耿云志先生的思想史	何卓恩 (14)
回忆先生二三事	梁景和 (18)
恩师之“耿”——怀念耿云志老师	方利山 (20)
怀念耿云志先生——兼忆一张屡被误读之照片	胡宗刚 (21)
回忆耿云志先生	侯中军 (22)
回忆耿云志先生	席云舒 (25)
追忆耿云志先生	秦素银 (31)
深切缅怀 我的小叔耿云志	耿凤文 (34)
从“人云”到“我云”——耿云志先生的思想及其承诺	张宝明 (35)

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历史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
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退休干部耿云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24 年 8 月 2 日 14 时 19 分在北京
逝世，享年 85 岁。

兹定于 2024 年 8 月 6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
举行耿云志同志送别仪式。

谨此讣闻

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同志治丧小组

2024 年 8 月 3 日

追悼耿云志先生挽联、唁电、唁函

宋广波整理

耿云志先生逝世后，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纷纷向“治丧小组”或者通过耿先生的弟子发来挽联、唁电、唁函，今整理如下。

一、挽联

情牵家国，风云经历，学术寄志向，
身处凡尘，淡泊生涯，耿介葆初心。

老友祁和晖 谭继和

坚毅精进胡学屹立立改开尺度
勤谨和缓耿范玉成成新后楷模。

何卓恩

自由之云端，有前贤长在。斯人之志向，赖后生继起。

潘光哲

师生情缘卅春秋，道德文章永不休。

臧运祜

云天寰海忙治史 志学重理不胡适

绩溪徐子超

擴養四端強恕而行尚居易以俟命
鶴鳴九皋聲聞於野但開風氣之先

後學封龍 泣挽

師恩永难忘，當年如坐春風里；
孺慕情長在，來日盡付讀書中。

学生贾维敬挽

有教無類 大德化人 始知漁父良多幸
高論別聞 先生誨我 猶痛後學再無緣

吴杰敬挽

教泽广施，虽宫墙外望，亦沾时雨；
音容已杳，痛脩然天际，空仰大贤。

吴杰敬挽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学术典型泽被后世
音容宛在勋业犹存大德高风永驻人间

李玉刚敬挽

呜呼一缕学魂西去奈何良师从兹沉寂
痛哉两行清泪长流难抑蓝友无尽哀思
耿云志先生千古

耿培炳敬挽

开山筑路，登高当有云志
掘渠引水，此地复宜适之

后学席云舒

耿耿天河，闪闪烛光，宗师远游逐云鹤；
仆仆风尘，修修汗竹，晚生难摘启晨星。

后学刘晨

著书立说传正道，默化四方子弟；
修己淑世显高德，实为一代宗师。

后学李俊领

辨冤白谤 表彰前贤求真史
发秘启藏 沾溉后学造新因

《胡适评论》同人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空忆昔年沾化雨
致其广大尽其精微再难座前沐春风

弟子郑匡民 左玉河 周敏之 林建华 泣挽

秉笔著春秋开九州之风气
述论究天人成一家之斯文

弟子郑匡民携再传弟子夏炎

治学六十载，思想深文化精声播海内
真学人风骨，尊德性道问学范垂后世

弟子张海燕 颜军 蔡礼强

勤谨和缓，温良谦雅润后学
专精深邃，学思睿智立典范

学生 暨爱民 王代莉 邱志红 苟军

师恩浩荡满人间，学子情深忆当年

弟子张顺昌

从客观事实循思维规律，志为生民求真理
具世界眼光张国入个性，欲替国家造新因

弟子 尹飞舟 邹小站 何树远 彭姗姗

二十年追随左右情同父子受教无穷
自今后继承遗志不遗余力以报师恩

学生宋广波、邱涛

二、唁电、唁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同志治丧小组：

惊悉耿云志先生不幸逝世，万分悲痛，我们为中国学术界失去一位年高德劭的泰斗同声哀悼，谨以至诚唁！

耿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清末立宪运动等领域，成就卓著，影响至深，是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耿先生之学识，享誉学林；耿先生之品格，蜚声宇内。耿先生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历史学者，为我国历史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先生学缘深厚，老一辈学者多与先生相交数十载，青年教师及学生也深受先生的教导。

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谨致唁电，敬表哀思！并向先生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敬悼 2024 年 8 月 2 日

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同志治丧小组并耿云志同志亲属：

惊悉耿云志先生逝世，不胜悲痛。

耿先生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著名专家，一生严谨治学，潜心研究，诲人不倦，成果丰硕，堪为学术界的楷模。

耿先生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老朋友，与中心有长期的学术往来，关心中心的发展，给予诸多帮助与指导，我们永远感念。

中心全体学人特发此专电，深表悼念。愿先生安息，请先生家人保重。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并耿云志先生家属：

惊悉耿云志先生逝世，不胜哀恸！

耿先生是我国学界泰斗，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成就斐然，影响巨大。他的品格与作为高尚，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将永远嘉惠学林，激励后学。

耿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在此悲痛之际，特致唁电，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耿云志先生千古！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24 年 8 月 3 日

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同志治丧委员会：

惊悉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不幸逝世，我们谨致以沉痛哀悼和深切缅怀，并向耿先生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耿云志先生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是我国胡适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并以此构建了富有特色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知识谱系的研究框架。耿云志先生学养深厚、怀才抱德，始终致力于推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和胡适研究，成就卓然，影响深远。近年来，耿云志先生对我所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耿云志先生的辞世是中国史学界的巨大损失，他的学术贡献和高洁品行，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史学研究的新征程上奋勇向前！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耿云志先生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2024 年 8 月 3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同志治丧小组：

惊悉耿云志先生逝世，《文艺研究》全体同仁不胜悲痛！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著有《胡适新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等重要著作。先生胸怀天下，关注现实，勤勉治学，淡泊名利，为我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转型做出了卓越贡献。

对耿云志先生的逝世，我们谨表深切哀悼，并向耿云志先生亲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耿云志先生千古！

文艺研究杂志社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日

北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惊悉著名胡适研究学者、历史学家耿云志先生逝世，胡适家乡——绩溪县胡适研究会全体同仁万分悲痛，特发唁电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先生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耿云志先生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胡适研究兴起和胡适学研究建构过程中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是备受海内外学界尊重的胡适研究代表性学者！耿云志先生生前多次亲临胡适家乡绩溪，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乡野调查、缅怀胡适先生，其情殷殷，其心切切，感人心怀。

耿云志先生精神不朽！

肃此电达

绩溪县胡适研究会

2024 年 8 月 3 日

惊闻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仙逝，曷胜哀痛！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耿云志先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者，造诣精深，著作等身，是学界公认的泰山北斗。耿先生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耿云志先生的逝世，是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史学会，对耿云志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全体家属致以悼唁与问候！

中国史学会

会长李捷

2024 年 8 月 3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治丧小组：

惊悉耿云志先生于 2024 年 8 月 2 日 14 时 19 分仙逝，我系同仁深感悲痛。

耿云志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强调史学研究要“跟着事实和逻辑走”，在胡适史料整理与研究、清末立宪运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等学术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耿先生对我系的学术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一直惠予关怀和指导。耿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耿云志先生千古！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2024 年 8 月 4 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耿云志同志治丧小组：

惊闻耿先生与世长辞，不胜悲悼！

耿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以及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胡适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推动了学界对相关领域的重新认识。耿先生学

术成果丰硕，其中《胡适研究论稿》、《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等多部专著，以及大量学术论文，为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耿先生一直关注和支持岳麓书院的发展，曾于 2016 年 11 月莅临岳麓书院出席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中心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及书院中国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永远感念他！

谨此向耿先生的家属致以诚挚的问候。敬请节哀顺变！

耿先生千古！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24 年 8 月 3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耿云志先生不幸辞世，我院师生不胜哀恸。

耿云志先生是我国知名历史学家、文化学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成就卓越，尤其在胡适研究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耿先生学垂典范，泽被后学，先生巨著《胡适研究十论》惠及学林甚多。

耿云志先生的辞世，是中国历史学界和文化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谨向耿先生家人表达深切慰问。

耿云志先生千古！

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24 年 8 月 3 日

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治丧小组：

惊闻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耿云志先生，于 2024 年 8 月 2 日不幸辞世，我院师生万分悲恸！

耿先生是成就卓著的杰出历史学家，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均有丰硕建树，对于清末立宪运动、胡适、近代文化转型的研究均有开拓、引领之功，为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

耿先生的深厚学养、扎实学风和谦逊品格，向为学界之典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受到先生的诸多支持。先生的逝世，是海内外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缅怀和感谢先生！

肃此奉唁，谨向耿先生的仙逝表示沉痛哀悼！先生之道德文章，风范永垂！唯望先生家属暨贵所同仁节哀珍重！耿云志先生千古！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24 年 8 月 3 日

北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惊悉著名胡适研究学者、历史学家耿云志先生逝世，特发来电唁电表达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同仁十分悲痛之情，并请代向耿先生家属表达悼念和慰问！

耿云志先生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胡适研究兴起和胡适学研究建构过程中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是备受海内外学界尊重的胡适研究代表性学者！他以胡适等近代关键人物研究成果为核心，构建出富有学术特色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知识谱系研究架构，鸿儒硕学，嘉惠后学！

耿先生生前多次来我校讲学，兼职我校胡适研究中心研究员。他的去世，是胡适研究界一个重大损失。

耿云志先生千古！

肃此电达

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

2024 年 8 月 3 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並呈耿雲志先生家人：

驚悉耿雲志先生仙逝，海內外學界無不深恻哀悼，深切緬懷。耿雲志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歷史學家，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領域成果豐碩，成就斐然。其治學主題初起於立憲史，大成於思想史，宏闊開放，貫通鎔鑄，後又聚論於中國近代文化轉型，追尋中國現代化道路。學術真知，建設於學科；學者精神，引領於史苑。其學術與生命歷程，實與中國近代進程及學科發展融會一體，殷切難分。

先生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室的重要開創者，又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胡適研究會會長、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長、孫中山基金會理事等學術職務，在推進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進步、培養傑出優秀人才、優化史學學術共同體建設等方面貢獻尤多。先生與本院學科奠基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創始人——已故的章開沅先生結下深厚友誼，對本院及近代史研究所的發展一向關心有加。厚誼無垠，銘記難忘。貴我兩方，將承繼前賢心志，共同致力於我國的歷史學科建設及人才培養大業。

青山雲猶在，千秋志當存；耿耿星河，殷殷家國。臨風追懷，含悲哀悼。

沉痛悼念著名史學家耿雲志先生並向先生家人、同事及弟子致意。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2024 年 8 月 3 日

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同志治喪小組：

惊悉耿云志先生逝世，深表悲痛！

耿云志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研究领域颇多开创引领之功，特别在胡适研究方面，可谓大陆地区学术界的领路人。

耿云志先生以史为鉴，脚踏实地，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做出了非凡的理论探索，彰显了历史学家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他对大陆地区胡适研

究的进步和深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耿云志先生一生，成果丰硕，桃李满天下，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并积极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海内外学术交流。他深厚的学养和人格魅力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

耿云志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南开史学全体师生向耿云志先生致以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向耿云志先生亲属致以真诚的慰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2024 年 8 月 3 日

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治丧小组：

惊悉耿云志先生遽归道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全体师生不胜震悼，沉痛缅怀！

耿云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深耕数十载，成就卓著，学林共仰。先生一生潜心治学，诲人不倦，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生前曾多次莅临西北大学讲学，对敝校历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多有指导。先生的逝世，不仅是近代史研究所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在此，谨向耿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向近代史研究所和耿先生的家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耿云志先生千古！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2024 年 8 月 4 日

耿云志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名誉会长耿云志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极其哀痛！

耿云志先生是中国著名史学家，他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近代人物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为学界所赞誉。耿云志先生道德文章、谦逊正派、提携后学，为学界所景仰。耿云志先生是中国大陆胡适研究第一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界一个学派的创建者，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耿云志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望耿云志先生的家属节哀顺变！

耿云志先生千古！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全体同仁

2024 年 8 月 4 日

北斗陨落，先生仙逝。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历史学，为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做出了卓著贡献。

《中国文化史研究》创刊，得到先生的大力支持，欣然题写寄语：“文化史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希望有志于此的朋友们，以世界的眼光，历史的智慧，观察和研究文化史，把昨天和明天顺畅地连接起来。”

先生去世，我们万分悲痛。我们一定会铭记先生的教诲，努力工作，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耿云志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编辑部全体同人

2024年8月4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惊悉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耿云志先生不幸病逝，不胜悲恸，深致哀悼！

耿云志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等职。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卓著，嘉惠学林。其《胡适研究论稿》《胡适年谱》《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等，凝聚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人实事求是和建构中国学术的宏伟志向。

耿云志先生是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兼职教授，生前十分关心支持聊城大学的建设发展，扩大了聊城大学历史学学科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力。耿云志先生的辞世，是我国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全体同仁将继续发扬先生实事求是的精神，将中国历史学事业发扬光大！耿云志先生千古！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24年8月4日

致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并转耿先生亲属：

惊闻耿云志教授辞世，本会同仁深感痛惜与不舍！

耿云志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在孙中山研究及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史诸多学术领域，潜心耕耘，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为学界所推崇，为推进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耿教授先后担任基金会理事、顾问，长期致力于弘扬孙中山的思想与精神，积极推动两岸和世界各地孙中山研究的合作交流，为本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本会同仁的敬重。

耿教授的辞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是本会的重大损失！本会同仁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耿云志教授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揣此函达

孙中山基金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五日

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同志治丧小组：

惊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耿云志先生不幸逝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体员工深感悲痛，特此致以沉痛的哀悼，并向耿云志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耿云志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工作，为我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深受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敬仰。他的离世，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我们出版社的一大遗憾。

耿云志先生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他的多部重要学术著作《胡适研究论稿》《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等先后交由我社出版。2023 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全八卷）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2 年中国历史学五部优秀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度十大优秀学术原创图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耿云志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社的学术出版事业增添了宝贵的财富。我们将永远铭记耿云志先生对我社的支持与贡献。

耿云志先生的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学者和挚友。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继续秉承耿云志先生的学术精神，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我国学术出版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愿耿云志先生安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年 8 月 5 日

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同志治丧小组：

惊悉耿云志先生逝世，不胜悲痛！耿先生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大家，他在胡适研究方面有开拓之功，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宏观探索和文化转型史的整体研究方面，厥功甚伟。耿先生思想开阔深邃，说理平和深刻，为人光明磊落，令人敬佩！他的逝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耿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经典论著，将长久地滋养着后代学人！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黄兴涛

2024 年 8 月 5 日

致近代史研究所耿雲志同志治喪小組

轉耿雲志先生家屬：

今天接宋廣波先生電郵，得悉耿雲志先生於今年 8 月 2 日仙逝，本人與全館同仁敬表哀悼。

耿先生是胡適研究專家，與敝館的淵源極深。早自陶英惠主任時期，敝館即開始與先生有各項學術交流，商談胡適著作的合作出版事宜，爾後交流逐漸密切。2007 年，耿先生嘗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來台訪問（4 月 29 日至 5 月 13 日），出席 5 月 4 日舉辦之「胡適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並發表演說。該次先生訪台，更深化了彼此合作，不久即與敝館簽署「編印《胡適研究通訊》合作協議」及《胡適研究論叢》編輯計畫。這些合作均對胡適研究的推動發揮極大助力。個人認為耿雲志先生的胡適研究及其對胡適研究之推廣貢獻，無疑係兩岸「胡適研究」第一人。

今驟聞耿先生仙逝，深表遺憾與不捨。在此企盼先生安息，其家屬親友能節哀順變，敝館也將秉持推動胡適研究事業繼續努力下去。

胡適紀念館主任林志宏暨全體同仁敬悼

2024 年 8 月 6 日

一部年谱要有灵魂 ——宋广波著《胡适年谱长编》序

耿云志

宋广波历二十多年的辛勤工作，编撰《胡适年谱长编》，500 万字，终于要出版了，实在可喜可贺。这是胡适研究的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相信这部书对研究胡适一定会带来很大的方便。

年谱或年谱长编，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史学体裁。千余年来成书并出版发行者据称可能有五千余种。1997 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黄秀文主编的《中国年谱词典》收录年谱、年谱长编或年表有四千种之多，这些年谱类著作，无疑是中国史学宝库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史学有进步，作为史学之一的年谱也应该有进步。从前的年谱，绝大多数都是门生故友或崇拜前贤的后辈所写，他们对谱主怀有极大的崇敬。所以每列一条，提及谱主必以敬称冠之。此风到近代亦无甚改变。还有，古人尊长，所以重年齿。人一出生就是一岁。若某人于年三十夜里出生，第二天他就两岁了。这很不妥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编撰《胡适年谱》时，便不循老例，胡适出生的 1891 年，只记出生月日，不写年岁。第二年，记一岁。谱中凡须提及谱主的地方，即直呼其名，而不用敬称。此年谱出版后，有几位朋友说，这部年谱是个创例。创例可不必说，总是有所改进而已。我很高兴地看到，广波这部《胡适年谱长编》采取了和我同样的方法处理这些问题。胡适先生提倡对待一切事物，一切问题都要采取评判的态度。我们为某人编撰年谱，不是因为，至少主要不是因为对谱主特别崇敬。而是因为我们是研究历史的，为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才编撰谱主的年谱。所以，应当以历史学家的评判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研究的对象。所以，对谱主特别冠以敬称是不必要的。

年谱贵详实。要尽可能搜寻材料，凡足以表现谱主生平活动、思想主张、性格作风者都应尽

量收录。但这不等于不做剪裁。任何文章、著作没有剪裁是不足以成著作的。近人胡颂平先生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十卷之多，曾给早年研究胡适的学者提供很大的方便。但不少人批评他的书太缺乏剪裁。凡是他认为胡适先生较重要的文章、书信，他都差不多全文录入。这些材料占去该书很大一部分篇幅。我想，颂平先生是一片好意，他希望读了他编撰的这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人，可以不必读胡适的原著，就可了解胡适的主要著述及其思想。用心固善，但做法实不妥。一则，能够表现胡适思想的文章，他未必能够全收。二则，他收录这些文章的时候有的有删节。要细心了解胡适思想，还必须查找原文来读。三则，他这种做法实有侵权之嫌。记得早年胡适先生曾批评容肇祖编撰的《公孙龙子集解》一书，谓“此稿（指容肇祖的书稿——引者）抄引过多，恐有碍诸书单行本之销路，似宜顾及版权问题（此在外国是不许的一一原注）。”颂平先生抄录胡适的文章肯定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其实是躲懒的办法。我前面明确地说，年谱是著作，不是简单的资料汇总。对谱主的著述，应当做撷取精华的功夫。这就需要认真细读谱主的著作，而且要有较好的思想训练，才能做好这种功夫。颂平先生不肯做这种太费心力的功夫，所以宁做简单的抄录工作。

中国的年谱著作甚多，真正好的实在不是太多。古人的，以王白田的《朱熹年谱》最受人称赏。近人的，以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为最受好评。我们看丁文江给胡适的信（丁文江 1929 年 7 月 8 日致胡适的信上说：“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

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 Life and Lettlers。”)可知,丁先生确实是把编撰这部年谱视作写传记的准备功夫,也就是草稿。但丁先生是大手笔,虽草稿在我们后辈看来也是上等作品。这部年谱长编,我最佩服它于任公一生凡较重要的事情,都有比较连贯的叙述。但也因此带来负面的影响,即作者为了连贯叙述一件事,有时把几年的事情糅在一起说,这样,时间顺序就显得不太清晰,似稍违年谱的体例。

做年谱也好,做传记也好,要想达到较高的水准,大概都要从三个方面努力:一,尽可能详

细地占有材料,并考辨其真伪;二,做剪裁的功夫;三,用连贯的记述,彰显谱主一生的追求,使一部书有了灵魂。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提出这些要求,可以鞭策我们朝正确的方向努力,真努力了,总可有一定的进步。

2022 年 10 月 20 日,北京泰康之家燕园

(《胡适年谱长编》,“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图书,国家出版基金 2019 年资助图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24 年出版)

《胡适留学日记(汇校本)》序

耿云志

曹伯言先生以九十岁高龄偕同他的长公子曹杨一起,于最近完成了《胡适留学日记》的汇校工作,真是可喜,可贺,可敬,可佩!

我同曹伯言先生因研究胡适而结识,从 1992 年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就是从 1992 年开始着手筹备编辑出版《胡适全集》的工作。伯言先生主动提出,他愿意承担胡适日记的整理和编辑工作。他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校勘整理的《胡适日记全集》,现在成了被征引次数最多的胡适作品之一。1995 年,我们决定在上海举办第四次胡适研讨会,因得到伯言先生的鼎力相助,这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承办的会议,非常圆满成功。伯言先生对于推动胡适研究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胡适留学日记》1916 年 12 月由胡适的朋友许怡荪用《藏晖室札记》的题名送登《新青年》杂志,后来 1939 年、1947 年先后由亚东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整部出版。我个人拥有的第一部胡适的作品,也恰好是 1947 年商务版的《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先生有一句非常浅显,其意义却极其深刻的名言:“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留美七年

的学习生活,是胡适整个人生的准备时期,他准备得十分充分,所以他的一生也就活得异常充实而多彩。

伯言先生先后两次整理校勘胡适先生的日记,而这次汇校《胡适留学日记》,已是对此书第三次校勘了。校勘工作是一件极须艰苦、耐心和细心的工作。中国历史悠久,古籍文献繁富,因流传久远,发生毁损、错讹、混淆的情况甚多,有些古籍甚至变得“不可理董”“不可卒读”。为了恢复原典的真相,所以整理校勘古籍,成为许多第一流学者的重要工作。例如著名的《水经注》,就是经过明代,特别是清代学者的校勘,才成为一部可读可用之书。回想三十多年前,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老先生有一次来信说,他偶读《论语·先进》,其中说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老先生说,从地图上看,沂水离曲阜有百余里之遥,他们何能当日去当日归?我查看一下地图,也有同感。于是,我想也许是沂水历时两千多年,发生过改道的情况。于是我查《水经注》一书,该书卷二十五《泗水、沂水、洙水篇》说:“夫子教于洙、泗之间,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

夫子领徒之所也。《从征记》曰：‘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阙里背洙面泗。’”这句话是说，当年孔子师生所在之地，在故城东北十七里左近之地。该书又说：“泗水自城北南迳鲁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平地发泉，流迳鲁县故城南。”这里只说沂水流经故城南，而未说沂水离城多远。按《水经注》行文，未说明距离里数，即为近乎零距离。由此说来，孔子和他的学生教读之地，距离沂水应不超过二十里远。这样的话，他们当日出游，当日回归，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复信给黄老先生的。但后来查明，沂水并无改道，如今曲阜城边修起沂河公园。沂水本来就在曲阜城边流过。当年孔子及其弟子去沂水洗浴，不过就相当于进一趟县城而已。如今，黄老先生在地下长眠多年，已不能与老先生细说此事。都怪我们当年所查看的地图，可能因是“文革”时期所刊印者，很不准确，以致造此乌龙。

我提起这件事，就是想说明，像《水经注》这样的“一大奇书”，是因得明清两代学者，特别是清代最杰出的三位校勘学者（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努力才成为一部可读可用之书。连我这样于历史地理学绝对外行的人，也能用此书解决一些问题。这完全是拜前贤校勘之功所赐。前人有说“翻译之功不在禹下”；我觉得，校勘之功，也不在禹下。《胡适留学日记》是近人之作，语言文字与当下习用者不存在大的差别，流传的版本也不过数种，自不能与古籍相比。但是这部汇校本的《胡适留学日记》，曹伯言先生父子是下了绝

大的功夫，他们一段一段、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地比勘各本，发现差异，分别出注，加以说明。他们在这次汇校过程中发现原手稿本与亚东排印本有许多不曾被注意到的差别。例如，因原手稿有语焉不详的地方，排印本有时会添加文字。这些添加的文字有的竟多达 200 字，即使有些是原编辑所加，也是经过胡适本人审读后给予认定的。这些添加的文字，对于理解原稿的内容很重要。不仅如此，《胡适留学日记》手稿中的大量插图和照片，其中有些在亚东出版排印本时，就曾弃用一些。经过仔细斟酌，曹先生父子决定全部予以恢复。部分从手稿中恢复的剪报，为不影响原排印本的流畅可读，伯言先生父子把它们分别编号置于该卷之末，这种处

理办法是很妥当的。还要特别指出，原手稿中各卷正文之前或之后，往往有些胡适的随手杂记。这是各种排印本都一概弃用的，现在在汇校本中都以影印的方式呈现。这些随手杂记，现在看来也许意义不大，但随着有关胡适的资料不断深入发掘，或许这些随手杂记到某个时候会意外地显现出某种意义来。

总之，这部汇校后的《胡适留学日记》，是迄今最为完整的印本。一书在手，有关原稿和各种版本的情况，皆一一呈现，给读者和研究者以极大的便利。所以，我们能够读到《胡适留学日记》的汇校本，应当深深致谢曹伯言和曹杨两位先生。

耿云志

2024 年 1 月 17 日于北京泰康之家燕园

耿云志先生的思想史学

何卓恩

8 月 2 日，耕耘中国近代思想史四十余载的耿云志先生与世长辞。耿先生是大陆地区胡适研究的前驱和中枢，从胡适研究而文化转型史研究而

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成就斐然，洞见深邃，深深感染后辈学人。重读耿先生著作，更加感念追怀耿先生学术贡献和道德文章。

一、思想史研究再出发

尽管历史学在中西社会都是古老的学问，但作为其分支的思想史出现却都不算早。在西方，思想史兴起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时史学界不满意于兰克史学，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制度，也应当研究人类的文化、学术、思想、经济、社会等等。于是，思想史渐成“新史学”的一部分。在中国，思想史伴随新文化运动而出现，出现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等一批思想史论著。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很快出现，1923 年蔡元培所作《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申报馆出版之《最近之五十年》所收）堪称先驱，而 1935 年郭湛波所著《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则标志着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诞生。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代表性成果，在 1945 年也问世了，如侯外庐所著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不过，1949 年后随着政权的更迭，中国近代思想史由于其现实关联性，开始接受阶级斗争史观的洗礼，演变为意识形态书写为主；“文革”期间，这个年轻的学科完全失去学术性，形同停摆。

1978 年底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恢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重新起航。侯外庐、李泽厚、蔡尚思等一马当先，出版了新时期第一批论述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论著；接着丁守和、彭明、耿云志等一批中生代专业学者，以及更多的少壮学人，相继推出一批又一批专题研究成果，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推进到具体的思想人物研究、言论刊物研究、社会思潮研究、观念演变研究等中观和微观层次，同时，通史性著作也日益体系化和深刻化，使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迅速出现百花齐放万马奔腾局面。

耿云志先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再出发的参与者，更是近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领航者，不仅在专题研究、通史编纂上卓有建树，而且在规范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范围、寻找学科主线、探索学科方法、建构学科体

系、培养学科人才梯队等方面，做出了学界公认的杰出贡献。

二、勤谨和缓 根深叶茂

耿云志先生 1938 年 12 月生，辽宁海城人，对思想与理论问题自幼有浓厚的兴趣，高中时期就读过朋友送来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又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折服于黑格尔深刻的历史发展观念和马克思强有力的辩证思维，开始潜心阅读许多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著作。1959 年报考大学，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哲学专业。不过大学毕业后，他没有进入哲学研究机构，却因特别的机缘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耿云志先生到研究所的前几年，先参加“四清”和“支农”，后“文革”发生，这一段时间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

到 1972 年情况有所变化。研究所接到任务，要组织人力撰写《中华民国史》。新朝为旧朝修史是中国传统，修《中华民国史》显然是新中国的责任，也是当时海峡两岸国共斗争的需要。研究所确定李新先生领衔主持，耿云志先生被纳入研究团队，分担“人物传”部分的学术工作，接下了《胡适小传》的撰写任务，得以系统接触胡适档案。

作为民国时期知识界领袖的胡适，当时仍被视为“反动文人”和“战犯”，是在大批判运动中被彻底否定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进行研究，哪怕只是写作小传，也存在很大困难。但耿云志先生仍一头扎进浩如烟海却凌乱不堪的胡适档案里，开启了日后用毕生大部分精力进行胡适研究的学术里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等立足史料的重头论文发表，随后一系列学术论文相继问世，1985 年集成《胡适研究论稿》出版，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普遍佳评，被誉为中国大陆第一部严肃、客观的胡适研究论著，填补了学术空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胡适的看法。

他不以此一轰动学界的成果为满足，继续深耕，除发表数十篇有关胡适的事迹考证和思想阐释论文外，还推出《胡适年谱》、《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和各类胡适作品集，嘉惠学林，并通过组织大型国际学术研讨活动，将国内的胡适研究与国际胡学研究打通，将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把胡学建设成为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牢固高地。耿云志先生曾用“为国造因，勤谨和缓”八个字总结胡适的学术精神，其实他的成就也是勤谨和缓、为国造因的心血结晶。

耿云志先生的胡适研究，不仅仅是基于史料的研究，而且也是放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的研究，把胡适放在新文化运动中进行研究，将新文化运动放在近代思想史全程进行关照。所以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耿先生又走向更宏阔的历史纵深，这就是他先后主持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研究”。这三大研究都是纵贯性的，是胡适研究的自然延伸，却使得胡适身上所浓缩的近代思想文化问题，在纵深的时空中得以复原全貌。三大课题成果《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一卷、《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九卷、《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八卷均具有流芳后世的里程碑意义，它们虽然都是集体分工合作所成，体现的却主要是耿云志先生的学术见解。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关于近代思想文化“走向”的见解。

三、世界化与个性主义

在胡适研究中，耿先生开始思考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贯穿始终的“走向”问题，1990年代，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即认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发展趋向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这也可以说是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关键。

为什么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耿云志先生有专门文章做完整的解释，也在各种研讨会上反复讲述过。他认为近代历史实质上就是追求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不是某几个具体的量化指标，而

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现代走向。“现代化主要是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发展过程、发展趋向。从外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世界化的过程；从内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个性化（即个人价值——自主权利及其创造精神——逐步充分实现）的过程。”（《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这两个过程所有近代国家概莫能外，而后发国家在这方面的纠结更显突出。近代中国的民主追求、文化转型、思想演变，都直面了这两个趋势，经历的过程却各有差异。

在世界化的层面，虽然中国是被动卷入世界化进程，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世界化趋势的把握却是比较快地化被动为主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冯桂芬、王韬等人逐步产生“大变局”观念，发现世界化不可逆转，这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也是文化更新的机遇，中国必须学会与世界各国相处，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智慧，并将自己的文化贡献于世界。维新变法时期，这些意识在康梁等人鼓吹下得到强化和深化，甚至不乏急激的反应。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将中国人的世界化意识推向了新的高度。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努力与世界文化建立密接关系，努力实现世界化的文化创新活动，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个性主义的认识和倡导方面，中国思想界的步子比较迟缓，相对世界化意识的产生与发展，要缓慢得多，曲折得多。洋务运动时期求富求强，都是在王权的规制下求出路，专制主义之下未能发生个性意识；直到戊戌时期，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们始提倡个人自由权利。戊戌以后到民国肇建这段时期里，革命运动与改革风潮互相激荡，人们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政治方面。“言自由则旨在倡民族自由以求独立；倡政治自由以去专制；于深层意义上的个性自由则注意甚少。”（邹小站访问笔录）即使维新思想家提倡个人自由权利，其根本目的仍在以新民构建新国，着眼点还是在国，个性主义受到国家主义的抑制。

好在民国建立后，人们检讨民主政治未能落实的原因，终于发现病根在于奴隶主义。“欲落实民主制度，必先求个体之自由，个性之发挥。因此，他们大力提倡个性主义，个性主义遂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思想话语。”（同上）五四时代的个性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年，使得五四后的中国，确有了一些新的气象。

耿云志先生不讳言，从后来社会思潮的变化来看，个性主义观念，甚至世界化观念，要在中国社会牢固确立，仍任重道远。这与文化传统有关，与中国人遭受过外国侵略的特殊感受有关，也与人们的认知方法有关。但这两个走向终究难以回避。

耿先生提出的世界化和个性主义“走向”说，可以说是从现代化的命脉上观察近代中国的思想轨迹，这种观察相对于学界通行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实描“主线”说，更强调根源性。这显然得益于耿先生对世界近代历史的观察和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历史的挖掘，是值得回味、值得深思的很重要的见解。

四、言犹在耳 教诲永存

我认识耿先生，应该是在 2006 年 8 月第二次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此之前，因为探讨自由主义思潮的缘故，阅读过耿先生的《胡适研究论稿》和《胡适新论》。我也曾就传统文化的价值问题写信向耿先生求教，很可惜几次搬家之后，所存信件大多无从查找，印象中耿先生回信除了鼓励我坚持这一方向的研究，也用较长篇幅解答了我的问题，大抵是说要同时避免片面的传统主义和片面的西化主义，而以现代化的视角取舍和转化传统。

终于见到耿先生，领受了一个尊者的春风拂面和温和谦逊。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我提交了一篇讨论陈独秀从清末民族主义走向民初自由主义的文稿，其中晚清民族主义并没有说得很清楚，聆听了耿先生讲述孙中山民

族主义思想演变的报告，深受启发。会下就近代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近距离受教更多。这个研讨会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中心组织的，由鲁东大学在烟台承办，此后，在聊城（自由主义）、洛阳（保守与激进）、北京（社会主义）、长沙（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西安（民族复兴）召开的系列会议，我都聆听到耿先生的平实而深邃的讲话。除了历次中国近代思想史研讨会，在绩溪、南京、北京举办的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我也荣幸地聆听到耿先生的肺腑之言。

在一次研讨会上，耿先生说过一句我一直铭记的话：“胡适研究的进步，人们对胡适的了解程度的提高，是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进步的天然尺度之一。”每次提到胡适相关的话题，我都很快想到这句话。耿先生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他曾发起胡适家乡中学生的阅读胡适征文评奖，希望青年学生了解新文化弄潮者对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思考。基于耿先生这样的愿望，我曾应一家出版社之约，选编了一小套适合社会青年阅读的胡适文集，出版时征询耿先生，想将他的短文《新世纪从头说胡适》作为代序，获得爽快答应。章开沅先生针对这套读本也说过很响亮的话：“胡适关于社会和国家建设的一些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科学发展观。”历史学家的洞见总是相通的，也许这正是耿先生希望更多人了解胡适的原因吧。

耿先生辞世时，我正在罗马参加会议，会间仓促发给耿先生弟子和助手宋广波兄一则挽联，无论格律，略表哀忱：

坚毅精进胡学屹立立改开尺度
勤谨和缓耿范玉成成新后楷模

耿先生安息！

（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回忆先生二三事

梁景和

2023 年 7 月 5 日上午恩师耿公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行成楼阅微厅做了一次“目标激动力，方法决定成就”的学术报告，我通过腾讯会议聆听了这场报告。我又一次从先生的治学理论中学到了非常重要的学术理念，尤其是进一步领会到关于树立学术目标和讲求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到运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研究方法在学术探索方面的重要价值，使我受益匪浅。记得是 2022 年 9 月 21 日，也是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行成楼阅微厅先生做了一次“关于近代思想史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我也是通过腾讯会议聆听了这次报告。这是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近代思想通史》2022 年 7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之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基本趋向和基本学术观点所做的一次学术报告。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做了两次大型学术讲演，这本身就令学人们感动和赞叹，我作为弟子对恩师在演讲中呈现给大家的精深思想和学术洞见而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钦佩和敬重。

1996 年秋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当历史系的有些老师知道我曾师从龚书铎先生、李侃先生、林增平先生、耿云志先生时，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称我出自学术名门，在我感受到了一种荣光之时，又感到了深深的惭愧。这不仅仅是我还根本没有达到恩师们对我的学术要求；还在于我在学术领域里表现得平平常常，而少为师门争光；更在于我还太缺乏恩师们所具有的宏阔的学术眼光、坚强的治学意志、深邃的思想能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和精神。我这一生在恩师的后面，因与恩师们距离相差太远而遗憾之极！

恩师耿云志先生是中国大陆胡适研究之父。先生 1979 年在《历史研究》第 5 期发表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1983 年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的《评胡适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以及 1985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研究论稿》和 1989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年谱》等论著开启了大陆学界真正从学术的视阈研究胡适的新阶段，具有思想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学术意义。《胡适研究论稿》的出版，反响极大，因为是 1949 年后中国大陆第一本研究胡适的学术专著，倍受海内外学者们的高度关注。这本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学术上的重要论著之一。耿云志先生 1990 年开始筹办纪念胡适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会议在绩溪召开，从全国各地来了七十多位学者与会。这次会议有两个意义，首先，这是学术界第一次以胡适为中心议题召开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对于恢复胡适应有的学术地位和个人名誉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会议把全国研究胡适的学人和对胡适比较关注的同仁第一次聚集到一起，大家互相切磋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胡适的学术阵营。这次会议对后来的胡适研究起到了一个推动性的积极作用。后来很多年轻学者也是受到耿云志先生的影响而走上研究胡适的学术道路的，以致胡适研究几近于“显学”，研究成果渐次丰硕，这一切与耿云志先生的学术影响和积极推动有密切的关系。耿云志先生是中国大陆胡适研究之父。

2022 年 7 月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一书出版，这是继先生主编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和九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两个大的集体项目之后，又一个重磅的学术项目，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首部通史性宏

篇巨著，它的出版宣告了一个学派的诞生。一个学派的诞生需要有几个明显的重要因素，一是有旗帜性的学术领军人物，他有长远的学术规划，有理论素养、有学术沉淀和被称颂的学术成果、能建立一个学术平台和建设一支学术队伍、有明确的学术理想、有分期的学术目标；二是已经形成了两三代学人的学术梯队、第二代学术队伍中在相关的学术领域已有几位有影响的重要学者；三是有重大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因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而被学界广泛认同和赞誉；四是所开拓的学术领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有不断持续研讨下去的广阔空间。正是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观察，我认为八卷本《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耿云志学派的诞生。

有时我会跟我的学生们讲，我非常愿意阅读恩师耿公的文章，他文章中那种语言精准、逻辑严谨、思想深刻、一气呵成的特质总是在感染和吸引着我，我希望有兴趣者可以去品读和欣赏耿公的文章。

先生道德文章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恩师对自己学生的学术成长更是精心培育，记得我刚刚进入博士后站，先生就告诉我要多读些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诸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等。先生说的这番话是在告诫自己的学生做学术研究要有一种必备的理论素养。为此我还专门购买了黑格尔的这套书，虽然阅读起来在理解和领悟方面还不到位，但对我来说，在后来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比较注重理论探索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在站期间，近代史研究所举办什么学术讲座或请人讲学，先生都通知我参加，以此来开拓我的学术视野以及对学术的多重感悟，这也是对我进行学术培养的一种方式。后来在每年的教师节和春节师生聚会时，先生都会不时地对学生们有所

教诲。

先生在日常中也对学生关爱有加。记得早年弟子们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给先生拜年时，先生会喜拿红包送给这些孙儿们，这种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的气氛，至今令人感动不已。尤其是恩师对自己学生的那种慈爱的情感也时常令人感慨万千。耿门弟子陈于武病逝，同门每人捐六千元表示怀念，先生拿出八千元以表思念。2023 年 5 月 27 日先生发微信吩咐我说：“于武后事还有一件是我一直关切的，就是他的博士论文。我经常催他，修改好了，争取出版。现在不知他的电脑在谁的手上，应想办法找出他的论文稿子，整理加工，争取出版”。根据恩师的嘱托，我们找到并整理了陈于武博士论文的电子版，恩师还对此事做了新的具体安排，让我们的小师妹彭姗姗进一步修正补充加工整理。这是一位导师对自己学生怎样的一种垂爱，令弟子动容不已！¹

2024 年 8 月 2 日先生驾鹤西去，弟子们感到无限的悲痛！为了研究先生的学术思想、继承先生的学术遗志、保存管理好先生的学术遗产，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有条件的耿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们要深入研究先生的学术思想，这不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研究事项，也是耿门弟子传承恩师学术思想的应有之举，更是为以后撰写《耿云志学术思想研究》的大型学术专著所做的前期铺垫工作，耿门同仁应当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并在其前后，也应做好多卷本《耿云志文集》出版的各项工作。

2023 年 8 月，2024 年 8 月补记

¹ 这是 2023 年 8 月写的一篇随笔，题目是《聆听恩师耿公的学术报告及其他》，2024 年 8 月 2 日先生去世后我对此文作了增补，并改标题为《回忆先生二三事》，以寄托对恩师的缅怀之情。

恩师之“耿” ——怀念耿云志老师

方利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徽州师专学报任文科编辑，兼戴震研究会的秘书长。在走近戴学的过程中，发现胡适对戴震这位了不起的老乡研探尤勤，1924 年和陶行知、梁启超一同发起戴东原诞辰 200 周年纪念，撰《戴东原的哲学》等倡扬戴学，特别是对戴震“水经注”学术公案重审，“路见不平一声吼”，竟用了二十多年死功夫，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仅《水经注》版本就收集了三、四十种，先后撰写了一大批论文、文章。我深深仰佩胡适的治学精神，也试着从戴震“水经注”学术公案重审进入，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之旅，撰写了一篇《胡适与戴学》，分两期在《徽州师专学报》上发表。1991 年，适值胡适诞辰 100 周年，省黄山书院的钱耕森、刘伯山等发起，在胡适的徽州故乡举办 1949 年以来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学校大力支持，参与主办。1991 年 8 月，徽州本土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在齐云山成功召开，白盾等知名学者参会。我们借兴起的“胡适热”，又马不停蹄，积极撰文，赶赴胡适家乡绩溪，参加 1991 年 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教授等主办的“胡适学术研讨会”。

在学术研讨会上，我们见到了王子野等老前辈，也结识了耿云志等许多久闻大名的胡适学专家。耿云志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全身心投入胡适学研究、宣传，不仅写了许多有影响的重头文章，出版了一大批重要的胡适著作和胡适学书籍，而且组织了不少胡适学学术活动。是我最敬佩的学问大家。我见到耿老师，印像最深刻的就是“耿”这个姓，耿，耿直善良，温和明亮，耿老师从事胡适研究的不一般的经历，那种坚毅自信，那种沉稳硬气，那种从容不迫，那种平和扎实，都让我钦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以后，只要有有关胡适学学术活动，只要耿老师一告知我，

我都尽量赶去参加，惟恐失去每一个学习机会。耿老师送来了胡适的著作和《胡适论争集》，鼓励我们写胡适研究论文，还特别送了我一本《胡适与友人》的珍贵书籍。耿老师知道我对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关注了好多年，认为此一学术题目，跨戴学、郦学，又属胡适学研究中尚缺少进一步探究的课题，而且这一研究，意义远超“重审”本身，总是勉励我好好钻研，写写文章。在和耿老师讨论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意义时，耿老师特别高兴地发现了：胡适在“重审”过程中，感知中国传统法制的不完备，历来没有给被告辩护的习惯，打官司总是被告吃亏的多。耿老师教导我，写论文，凭材料，重证据，事实说话，连引用注释的版本、页码都不可马虎，而且需勤、谨、和、缓，认真小心，得步步走稳。耿老师是 58 个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之一，多年来真学人的道德风范，严谨平和的学问风格，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

1995 年 8 月，有幸到华东师大参加上海“胡适国际学术研讨会”，耿老师给我们引见了唐德刚、傅安明、周质平等内外胡适研究的知名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耿老师还特意安排著名地理学家杭州大学的陈桥驿教授和我分别在大会宣讲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论文，相互交流讨论，使这一胡适学议题得到更多学者关注，与会者对耿老师高超的学术研讨技巧驾驭印象深刻。

耿老师学术任务繁忙，身体累坏了，癌晚期仍不肯住院。今年在胡成业、曹伯言之后，又接着匆匆仙去。痛失恩师！胡适学研究痛失领军！

耿老师真学人，精神不朽！

2024 年 8 月 3 日于屯溪近贤居之藤浦书堂
(作者系黄山学院教授)

怀念耿云志先生 ——兼忆一张屡被误读之照片

胡宗刚

近年时常惊悉与我有所交往之前辈学人逝世消息，闻之痛悼不已，总要回顾与其交接往事，也总让人感知自己亦已老矣。每届此刻，当写下怀念文字，一以送别逝者，一以释放幽怀。昨获悉耿云志先生去世，翻检旧稿，将其改写成此文。

我与耿云志先生交往，始于向其索要其所编著《胡适及其友人》照片集一书。该书于 1999 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我至 2002 年 4 月才获悉有此照片集出版。其时，我已在庐山植物园开始搜集胡先骕生平资料，以便编纂其《年谱》。胡先骕与胡适曾就新诗创作大开笔战，此前也曾拜读耿先生所编《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其中收有几通胡先骕致胡适手札，知二胡早年交往甚多，只是对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展开持不同观点而已，以为在胡适照片集中应有胡先骕身影。本人独处一隅，无从获得该书，遂冒昧驰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希望得到一册。不久得到先生复函，云该书其手头无复本，待向出版社购置之后惠予。两月之后，2002 年 7 月奉到耿先生下寄之书，书名页上还耿先生之签名，让我喜出望外。该书精美，反复展读，发现有几张照片中有胡先骕，但均未标明，还有一帧胡适与胡先骕两人合影，却被标为胡适与陈独秀。

胡适与胡先骕两人合影，拍摄于 1925 年上海，胡适题为“两个反对的朋友”，是一张珍贵照片。胡适照片集出版之时，正是中国大陆学界重温胡适之于中华民族贡献之时，一时各种著作纷纷问世，不少即用到此照，但均标识为“胡适与陈独秀”。

起初，本人对胡先骕年轻时照片所见无多，对此与胡适合影照片是否为胡先骕尚不敢断论，

持之询问胡先骕嗣哲胡德焜先生，得到肯定，遂致函耿先生，指出其辨识有误。耿先生虚怀若谷，回函表示感谢，并云有机会将予以更正。其时，学界对胡先骕其人其事还知之甚少，将其容貌误作他人，并不奇怪。

与耿先生函件往来之后，是年初冬，先生公务来庐山，还获邀请至其下榻之宾馆交谈。先生对我以业余身份治学，倍加鼓励。此有拙著《不该遗忘的胡先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年）和《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年）有幸出版，书中均使用该幅珍贵照片。问世之后，皆持赠先生正之。

耿先生自行更正其误在 2012 年。是年胡适照片集在大陆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版，书名改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耿先生再赠我以新书，且书之后记作公开致谢，余受之有愧矣。他写到：

繁体字版书第 48 页第 44 图（本书第 48 图），胡适原题“两个反对的朋友”，我误判为胡适与陈独秀。江西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先生，他是研究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有年，他发现照片上的朋友不是陈独秀，而是胡先骕。接着并陆续寄来胡先骕先生的照片和有关资料。他帮助我改正了这个严重的错误。

耿云志先生是研究胡适专家，对我如晚辈，先是慨然赠书，已让人感激莫名；我偶尔指出一点错误，不仅采纳，还作文感谢，实不多见。前辈风范，后学当时铭记。十余年来，本人有芜作出版，遇有不相识之读者来函索要，总是尽量予以满足。今作此小文一为道明合影照片更正之原委，也是宣传此种学术交往之风，希望能广为

传播。

耿先生为劫后研究胡适第一人，不仅编撰《胡适年谱》，还有《胡适研究论稿》，而 1979 年编辑三卷本《胡适来往书信集》，一时被广为引用，后更有四十二大卷《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出版。先生为中国社科学院学术委员，2005 年该委员会出版《文库》，其中有《耿云志文集》，余亦得馈一册。2007 年余在北京，时已开始编撰《秉农山

先生年谱》，为获资料，曾往先生在太阳宫寓所请教。此后，几无来往，2020 年拙编《秉农山年谱》向出版社交稿，心想待出版之时，当向先生敬呈；然而至今拙编尚未问世，先生却已归道山，能不长叹乎！

（作者系庐山植物园研究员）

回忆耿云志先生

侯中军

2024 年的暑期，酷暑闷热。在全院刚刚进入暑休的第二日，突然得悉噩耗，耿云志先生于 8 月 2 日 14 时驾鹤西去。得悉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已经预定 8 月 3 日赴山西太原，应邀参加中国地方志办公室召集的《中国抗日战争志》的评审会议。按照会议原定议程，8 月 5 日下午可以结束评审，经提前与会议方商定，我预定了 8 月 5 日晚返回北京的高铁，以便能参加定于 8 月 6 日上午 10 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的先生遗体告别仪式，送先生最后一程。

到达太原后，8 月 5 日的会议评审未能如期完成，会议方要求 8 月 6 日上午继续评审。我所在的分组志书内，评审小组只有 3 位专家，不得已，只好改签了回北京的车票。此次改签，导致我未能如期赶回北京，错过了先生的追悼会。

先生系学术大家、敦厚长者，作为先生的后辈、学生、同事，自得悉先生仙去的消息后，我头脑中不时闪现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伤感暗自中来，往事历历在目。

一、寄语所内青年：关键是要写，要写出来。

耿云志先生在学术界的大名，我早有耳闻。2002 年，我准备报考博士时，先生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招收博士研究生。2003

年秋，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我们那一届，近代史系一共招收了 8 名博士生，其中就有先生的在职博士生陈于武老师。当时，张顺昌师兄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已经是第三年。在望京中环南路的研究生校园里，他经常向我聊起先生，使我对先生的认识逐渐丰满、具体起来。可以说，我对先生的了解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那时，所里的青年学术论坛已经颇有影响。与现在的学术环境不同，当年面向博士生的学术会议很少，我们这些博士生，自入学后便期望能够参加会议，以便近距离接触所里的老师，接受正规的学术熏陶。受惠于耿先生的博士生、当时在科研处工作的陈于武老师，所领导非常重视同学们的愿望，于 2005 年向博士在读二年级的学生提供旁听青年学术论坛的机会。那一年的论坛在宋庆龄故居（后海附近）举行，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当时参与盛会的激动心情。

印象中，只要时间允许，先生总会出席青年学术论坛，并在总结阶段发言。2006 年我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几乎参加了每一届青年论坛。可以说，耿先生的每次发言，都令我受益匪浅。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也影响至深的是 2008 年那次。我依稀记得，那时先生刚做完一场手术，到

会场时还坐着轮椅。先生发言的声音很轻，但每句话我都听得很清晰。先生讲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并以自己的发表为例，鼓励青年学人：写文章固然要出精品力作，但首先是要写，不要因为畏难而迟迟不动笔，作为研究人员，一辈子能有两三篇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论文就很了不起了。你写出 10 篇论文来，有 1 篇让自己满意的，就是进步。也是在那次青年学术论坛上，我得以与耿先生聊天。他感慨，年轻时条件艰苦，反而能静下心来安心读书，心无旁骛地出一些东西，现在条件好转了，反而被很多庞杂事务缠身，没有精力和心思安心做研究了。我想，耿先生用自己的经历，认为清贫奋斗时期能出成果，是对青年科研人员的鼓励吧，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鼓励青年同仁安心学术，耐得住寂寞。

耿先生那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学术荣誉加身，获得学界广泛认可。先生对于青年学人的寄语，语重心长。

二、老党员的发言：党内要讲真话

2006—2009 年 9 月，我在近代史所科研处工作，那也是我与耿先生接触最多的时期。当时我主要负责外事和有关所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日常工作。先生是学部委员、所学术委员，对于科研工作的管理，有自己的理解。从科研处进入研究室工作后，我和耿先生虽然不在一个研究室，但同属一个党支部，有了共同参加党内组织生活的机会。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是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栾景河主任。耿先生作为老党员，在组织生活中的态度和发言，体现了近代史所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对我影响很大。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上，耿先生首先发言，鼓励同志们要说真话，如果在党内的生活会上都不说真话，哪里还能说些真话？我们现在所讲的“红红脸、出出汗”，在所内老一辈共产党员那里早就已经有了很好的遵守和传承。近代史研究所从延安走来，出身不凡，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在近代史所学者

身上已经是一种深入精神气质的底色。我来所求学、工作迄今已 21 年，始终记得耿先生在这次党内民主生活会上的谈话。“党内要说真话”，这看似普通的言语，非经每个个体岁月的磨炼，难以体味其中的宝贵。每当我感到困惑和迷茫时，会不自觉地重温此句以得到激励。

近代史研究所在学界的学术地位，依靠的不仅仅是一本本学术著作和一篇篇学术论文，除了这些有形的成就以外，更多的是那些无形的宝贵财富，其根脉则在于延安以来包括耿先生在内的一代代科研人员对革命精神的传承。

作为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近代史研究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所以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耿先生在支部发展党员问题上，既务实又开放，他针对科研机构的实际情况指出，尽力吸引、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党的队伍，当然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关系到党的自身发展，但是把一些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留在党外，同样可以发挥其作用，有时候可能发挥的作用更大。

三、向先生请教关于胡适使美的学术问题

2011 年所里组织国情调研，东北、西北、东南各个大方向分了几个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考察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围绕其教育功能的现状提出问题及改进建议，为博物馆的进一步建设及发展提供近代史学界的智力支持。东北方向的大组分 2 个小组，我所在的调研小组一行 10 人，由耿云志先生带队，成员有于化民、罗敏、李玉刚、贺渊、张丽、宋广波、周斌、侯中军、吕迅等。辽宁是先生的故乡，此次调研，我们跑了东三省几个著名的博物馆，从九一八纪念馆到伪满皇宫博物院，从大帅府到辽宁省博，耿先生带领我们调研博物馆的同时，插空给我们讲述他当年求学的故事。先生提及自己的高中时光，不经意地说，轻轻松松就能考第一名。记得在一次晚上的谈话中，先生告诉我，早年间，他曾向院里建议重点建设中外关系史学科，增大对近代外交史的研究

力度和投入。他说，我自己做的是思想文化史，但我仍然要说，外交史对于中国近代太重要了，很多基础问题都和外交有关系，一些重大的外交事件都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先生这番话让我印象深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或许领略到先生此番言语背后的学术关怀。2017 年暑期，我赴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在查阅战时中美关系文献时，无意中发现了胡适与亨贝克（S. K. Hornbeck）之间往来的一些英文书信。先生是胡适研究的大家，是国内研究胡适的开拓者和领军者，并毕生致力于胡适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在日常向先生的请教中，我向先生提及了这些胡适的书信，先生很感兴趣，并让我与彭姗姗老师联系，由她转交。2019 年 1 月 3 日，我通过邮件向彭老师提供了相关书信及文件，并将书信及胡适与亨贝克谈话记录的摘要大略翻译成中文。后来姗姗老师告诉我，她又翻译了亨贝克的报告，并于 1 月 9 日发给了先生。这些资料对于客观评价胡适使美的外交成绩具有重要价值。

抗战爆发后，胡适衔命出使美国，为中国争取抗战外援奔走呼号。如何评价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型外交官的成就，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这也牵涉到对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整体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先生曾在《胡适与抗战》一文中指出，胡适使美四年，“尽管奔波忙碌，但从纯粹的外交角度看，他的成绩实在太平常”，但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争取美援，帮助陈光甫完成 2500 万美元桐油贷款及第二次滇锡借款；二是为中立法案一事奔走，说服美国搁置“现购自运”；三是阻止美日妥协，在 1941 年春美日谈判中，坚决反对美日之间牺牲中国的妥协方案。我个人认为，先生以其惯有的谦虚态度，事实上肯定了胡适的成绩。因为先生在接下来的评论中写到：“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人士对胡适外交成绩过分苛求是很不公道的。他们对美国期望太高了”，国民政府忘记了，美国对华政策“不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是

根据它自己的需要来制定的”。我深以为然。

四、与先生的最后两次见面

疫情三年过后，先生曾两次到所做报告，其中一次是 2023 年的 7 月 5 日，报告的题目是《目标激发动力，方法决定成就》。报告当天我因其他事情，错过了开场的环节，等我到达阅微厅会场时，先生的报告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进入会场后，我坐在先生正对面偏远的位置座。当时先生正为在场的同仁介绍自己的研究心得。先生的发言依然字字珠玑，引人入胜。在互动交流环节，先生环顾四周，看到我，隔着桌子问，你是侯中军吗？怎么看着还这么显年轻呢？大家不禁被先生逗笑了。先生问完这句话，自己也笑了。我连忙回答就是我本人。我说，耿老师，我都快 50 了，眼睛花了，发际线也越来越高，不年轻了。先生这次轻松的调侃，让我倍感温馨，我在先生心目中还是那个求学的博士生、科研处的青年人、研究室的小侯。

最后一次在历史研究院见到先生，是在去年年底近代史所纪念范文澜诞辰 13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先生此时已经显得有些疲惫。在此次纪念会议上，先生回忆了与范老生前共事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回忆了胡适档案入藏本所的历史经过，高度肯定了近代史所建所以来由范老传承下来的重视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的优秀传统。我本想在会后去问候先生，但看到先生周围围绕着关心和爱护他的晚辈和同仁，我最终没能走上前去，谁曾想，这竟然是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先生从患病到去世，仅短短数月，走得太过突然。我至今为自己没有前去探望，未能见先生最后一面而懊悔。先生走后，我把他主编的最后一套经典巨著《中国近代思想通史》放在案头，时时研读。我永远怀念先生！

（侯中军）

回忆耿云志先生

席云舒*

*8月2日下午2点19分，敬爱的耿云志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欧阳哲生教授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深感震惊，恍如晴天霹雳，呆坐半晌不能言语。因为就在一个月前，彭姗姗博士邀请我参加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与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姗姗特意告诉我，是耿先生点名邀请我参加的。由于去年学校派我来援疆，要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工作3年，暑假里校区安排我带学生实习，时间正好冲突，我只好遗憾地告诉姗姗，这次我无法回去参会。姗姗说耿先生病了，目前住在燕园养病。据我所知，耿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几年前住进了京郊一所高级养老院，在那里读书写作，完成他多年来念兹在兹的《胡适传》。姗姗没有讲耿先生的病情，而我也疏忽大意，觉得以耿先生85岁的高龄，有点小病小痛也很正常，养老院条件再好，医疗水平毕竟不如医院，如果是大病，应该住进协和或北医三院，而耿先生住在燕园养病，附近似乎只有北大校医院医疗条件尚可，因此我想当然地以为耿先生病情应该不甚严重。况且我来新疆后，多次跟耿先生通电话，有时通话长达一个多小时，老人家很健谈，一直说自己身体很好，电话里也丝毫听不出疲惫的样子。没想到耿先生今年6月检查出胰腺癌，他不愿让学生担忧，除身边几个弟子外，别人均不知情。所以当我得知耿先生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感到震惊，一方面也为没能回京参加他最后一次点名要我参加的学术会议而深感自责。

刚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姗姗所说的耿先生住在燕园养病，也许不是北大燕园，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也叫“燕园”？于是连忙向姗姗求

证，果然，耿先生住的养老院就叫北京泰康燕园养老社区，位于昌平南邵镇。那里设施齐全，生活起居都有人服务，先生可以安心写作。原来我完全搞错了，错把昌平的燕园社区当成了北大燕园。姗姗说耿先生5月底回了一趟海城老家，返京不久就感到身体不适，一开始社区医院诊断为胰腺炎，经过几天治疗不见起色，于是两个女儿和弟子们便赶紧联系了北京医院和协和医院，很快被确诊为胰腺癌。姗姗还联系了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耿先生起初答应先把病历发过去看看，但6月中旬协和确诊后，耿先生便拒绝把病历发去上海的医院，并拒绝手术和放化疗，他不愿把有限的宝贵时间抛掷在医院里，执意要住回燕园社区。耿先生自己和弟子们都以为还能有一年到一年半左右时间，先生可能是想抓紧时间完成手头的工作。胰腺癌会带来剧烈疼痛，先生便靠吃止痛药镇痛，可是止痛药又容易使人嗜睡。等到7月中旬姗姗再次去燕园社区看他，先生谈话就已经比较吃力了。

我和耿先生相识也晚，但他的《胡适研究论稿》《胡适新论》《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等著作我很早就读过，而他的《胡适年谱》多年以来一直是我的案头书，他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胡适论争集》（上中下册）等更是胡适研究领域的富矿。大约是2013年12月上旬，我忽然接到胡适研究会秘书长宋广波先生的电话，邀请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当月17日举行的胡适研究会学术年会，那时候我才发表过一两篇胡适研究相关论文，广波先生说他打电话到我们学院才找到我的电话，时间很紧，我来不及准备年会的论文，广波先生嘱我介绍一下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即可。于是我在那次年会上初次见到景仰已久的耿先生和正在跟他做博士后研究的彭姗姗博士，我介绍了自己近年来搜集整理

*作者简介：席云舒（1973—），原名席加兵，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文理学院/文化艺术学院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胡适考论》等。

胡适英文佚文的情况，耿先生对我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说他们这一代研究胡适的学者，最大的局限就是不懂英文，耿先生念大学时学的是俄文。

后来我和耿先生的交往便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广波先生和姗姗博士约我在太阳宫耿先生家附近小聚，那时候耿先生还没住进养老院，姗姗已经留所工作。席间，先生问起我胡适英文论著搜集整理的进展，他说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44 卷）漏收了很多文章，不只是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这套《全集》基本上是出版社组织编辑的，专家参与比较少。90 年代中后期，耿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安徽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找到他，希望出版《胡适全集》，而耿先生也久已有此愿望，但出版社派人从近代史所复印去大批资料之后，可能是由于工作量太大，组织专家编撰需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出版社预算有限，便只好自行组织编辑。编撰 44 卷本《胡适全集》，其难度可想而知，安徽教育出版社也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虽然各卷都邀请了专家审稿，但由于并非全部由专家直接参与编撰，出版社的编辑很难做到比专家更熟悉胡适著作和文章，因此各种遗漏和差错在所难免。尤其是胡适的英文文章，除周质平先生主编的《胡适英文文存》（三册）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收录的文章，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胡适档案里收藏的少量英文手稿外，一直没有人专门去搜集整理胡适的英文佚文，所以耿先生听说我搜集了两百多篇胡适的英文佚文，他感到非常高兴。遗憾的是，直到耿先生去世，我编的这套《胡适英文文集》尚未能出版。

那天耿先生还提到，二十多年前有人送给他一张报纸，上面有一篇胡适的德文文章，是写斯宾诺莎的，可是年长日久，那张报纸再也找不到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到。我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胡适的英文佚文，但我不懂德文，没有意识到查找德文文章并不比查找英文文章更困难。2020 年 3 月 27 日晚上，我跟陈通造博士说起此事，没想到他很快就从网上找到了这份报纸，原来是一

份在华发行的 *Deutsch-Chinesische Nachrichten*（《德华日报》），该报 1932 年 11 月 24 日出版了一期纪念斯宾诺莎诞辰 300 周年的专号，胡适写了一篇《斯宾诺莎与庄子》，该报第 10 版刊登了胡适的中文原文，第 6 版刊登了 von John Heftner（冯·约翰·赫夫特）的德文翻译，此文英译文在斯宾诺莎逝世 300 周年时又被收进了 Siegfried Hessing（齐格弗里德·黑森）编辑的 *Speculum Spinozanum 1677-1977*（《斯宾诺莎纪念文集 1677—1977》）。但海峡两岸公开出版的各种胡适文集中均未收录这篇文章。胡适在文中比较了斯宾诺莎与庄子思想的异同，认为二人最大的相同点是泛神论和绝对命定论，不同点则是他们的方法论。找到这份报纸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转给耿先生，他托我转达对陈通造博士的感谢，并说：“因时间久了，加之，我又不懂德文，所以，不能十分准确地判定。以印象论，德文本的版面情形与记忆颇符合。”

三年疫情期间，防疫管控对养老院尤为严格，外人无法前去探视，耿先生也无法出来跟朋友和学生相聚，但他仍不时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传来他的新作，我总能在第一时间拜读、学习。2022 年 6 月 29 日上午，姗姗打电话给我，说耿先生的《重新发现胡适》一书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增加了不少 2000 年以后的文章，想让欧阳哲生教授和我分别写个审读意见。听说耿先生著作修订再版，我非常高兴；但提到写审读意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连忙说使不得，只有耿先生给我们的书写审读意见，哪有晚辈给耿先生的书写审读意见的道理？姗姗再三解释，出版社需要两位专家的审读意见，书稿方能付印。了解到审读意见只是给出版局备案使用，我只好答应下来。读完耿先生的修订书稿，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耿先生不改旧文。耿先生常说，他对胡适和胡适思想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很多问题并非一开始就能认清的，而是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慢慢才想明白的。《重新发现胡适》修订本收录了耿先生自 1979 年至 2019 年的文章，时间贯穿了整整 40 年，而这个认识的过程也完整地呈现在这部书稿里。对于几十年前的观点，耿先生都忠实地予以保留，有

的则以“附记”的形式加以说明，但并未直接修改。他这样做，一方面是要给历史留下真实记录，对于过去的一些不够全面的看法，有“立此存照”的意味；一方面也是希望后辈能了解到，他这一代学者对胡适的认识是如何逐步深入的，让后辈明白思想解放之不易。

我给《重新发现胡适》修订本写的审读意见，本来并未打算公开，但其中涉及对耿先生及其书稿的评价，今天看来并未“过时”，因照录如下：

耿云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当代胡适研究的奠基人和胡适史料整理的集大成者，耿先生潜心研究胡适四十余年，他的《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初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修订再版）、《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初版、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 年修订再版）、《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 1996 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修订再版）、《重新发现胡适》（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版）、《胡适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以及他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 册，黄山书社 1994 年版）、《胡适论争集》（上中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他参与主编的《胡适书信集》（上中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和《胡适全集》（44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等，都是胡适研究和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著作，泽被了无数后学。

本书是在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版《重新发现胡适》的基础上修订再版，删减了 4 篇并非直接研究胡适或与其他论文内容略有重合的文章，又增加了 18 篇 2000 年以后的文章，涵盖了作者 1979 年至 2019 年间重要的和最新的胡适研究成果。虽然名为修订，其实有近半内容均为新增，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本新书。我个人认为，本书至少有 5 个方面的特点或优点，足以体现

其出版价值。

一、内容的丰富性。本书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从《新青年》的思想及“新青年”群体的合作与分歧，到胡适本人的思想及其与各界的关联，如胡适的文化观与价值观，他在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他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的思想与活动，他与蔡元培、陈独秀、梅光迪、梁启超的关系及思想、学术与政治态度的比较；作为外交家的胡适，他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抗战争取支援，作为学者与教育者，他又有哪些观点……本书都一一给出了解答。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恰恰在多个方面、多个层面都是开新风气者，本书论述了他的多重身份，构成了观察他的多重视角。

二、史料的可靠性。胡适留在大陆的报刊、文稿、书信等资料绝大部分都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对这些史料做过系统的整理，出版了多种大型胡适资料集，这些材料都是本书的研究基础。此外，本书也运用了大量《胡适日记全集》、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以及其他各种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材料。史料是研究的基础，耿先生占有大量第一手的史料，论从史出，因此本书的观点具有充分的可信性。

三、方法的科学性。耿先生长期研究胡适，他的研究方法严格遵循胡适所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原则，在“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基础上提出合理怀疑并展开论证，观点严格地建立在充分可信的证据之上。例如有关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近年来学界虽然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又有过很多讨论，耿先生文末以“附记”形式交代了学界的讨论进展，但由于有一个关键证据至今未能发现，因此耿先生未改变他四十前提出的合理怀疑。而旧版中《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一文，由于“此文材料不够全面，后来有学者写出更全面的论述，这一篇就没有保存的价值了”，

该文则被从本书中删除。这充分体现了耿先生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态度的严谨性。

四、观点的客观性。建立在充分可信的材料基础上的研究，观点自然具有客观性，这一点毋庸赘述。耿先生书中的绝大部分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客观、非常中肯的，三四十年的文章至今并不显得过时，这种扎实的研究，极为难得。

五、历史线索的清晰性。四十多年来，耿先生一直坚持不改旧作，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种坚持。对胡适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多少都会带上时代的印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新史料的发现，人们对胡适的认识也会变得更加全面。耿先生的做法是，旧文的材料和观点照旧保留，发现了足以更新观点的新材料，就根据新材料重新写文章。本书收录的 2010 年以前的文章，除《胡适一生的五个阶段》一篇是作者 2018 年的扩写版外，其余均未作修改，修订和删减的篇目，作者也在“再版序”中做了说明。但这次修订，改为编年编排，这不仅可以使读者充分了解胡适研究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而且，正如作者所说，“对胡适的认知的改变和深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开放社会条件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胡适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的转捩点，对胡适的认识，可以说就是对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认识。基于作者敏锐的思考及其对胡适相关史料的熟稔，本书对认识胡适及其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也是提供给青年学子的一本重要的参考著作，书中新增的篇目，虽然都曾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过，但均为首次结集，本书也因此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及文化价值。耿云志先生的这本文集，是丰富而扎实的，对胡适的评价十分客观，如其书名所示：重新“发现”胡适。本书不存在任何政治敏感问题，是非常值得出版的一本好书。

需要说明的是，前文所说的耿先生“对胡适和胡适思想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以上审读意见第四条所说的“观点的客观性”并不矛盾。耿先生的学术观点都是建立在充分可信的材料之上的，但新材料的发现却并非一蹴而就，科学研究的发展正是随着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出现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在新材料出现之前，根据旧有材料得出的观点，也许可以说不够全面，但不能说不客观。况且，近几十年发现的胡适研究新材料，跟耿先生掌握的材料相比，恐怕只能形容如河伯之于北海若，而耿先生却不断地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更新着他的观点。这种从不固步自封的态度，对于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来说，尤为难得。耿先生收到我的审读意见后，曾专门给我一信，信中说：“您如此认真地写这篇审读意见，令我十分感动。”然而转眼时间又过去了两年，直到耿先生去世，仍未见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重新发现胡适》修订本面世。

2023 年春，“中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丛刊”的编撰者黄曙辉先生找到我，邀请我为即将重印的胡适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写一篇“导言”，我花了一个暑假时间写了一篇 6 万多字的长文，谈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涉及胡适的博士学位。文章写成后，又被《关东学刊》主编谢小萌先生索去，在 2023 年第 5 期以小五号字 36 个页码一次性刊登了全文。该刊公众号推送后，耿先生跟我要去《关东学刊》电子版。我当时心里颇为忐忑，因为我根据自己搜集到的多封胡适致汪原放的书信手稿，和未公开出版的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哲学系教授、杜威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Larry A. Hickman（拉里·希克曼）编的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杜威往来书信集》）电子版等新材料，在陈通造博士《新史料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再探讨》一文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更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并非如唐德刚先生所说，即所谓在杜威帮助下，将胡适博士论文从“大修通过”改为“小修通过”。而唐德刚先生的观点，恰好是耿先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写的《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

一文中所支持的观点。正如上述审读意见第三条所说，直到《重新发现胡适》修订本中，耿先生仍坚持他的“合理怀疑”。怀疑是学问的开始，胡适曾多次援引张载的话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赫胥黎所谓“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也是要对“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提出怀疑，杜威的“思想过程五步说”前三步即是提出怀疑和假设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胡适也有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可以说，没有怀疑就不会有学术的进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怀疑和假设很重要，求证则更重要，而我给出的证据链，恰恰可以消除耿先生的这一怀疑，也就是说，我在文章中提供的新证据，足以证明胡适的博士学位毫无作假的嫌疑。但我的观点毕竟跟耿先生相左，不知老人家看了会不会生气。

没想到几天后，耿先生给我发来一信：

云舒先生：

大作拜读一过，获益甚多。文章虽长了些，但作为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名人名著的导言，是很必要的。关于《先秦名学史》一书所做的研究，非常系统而又全面，这是对本书一直没有受到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的一种令人欣慰的补偿。而这项工作却不是谁都能做的。文中有不少学术信息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所以非常感谢阁下。

关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阁下也贡献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很可佩服。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本来并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但经过几代学人的讨论和争论，却发掘和展开许多平常大家不很注意的一些问题和新的史料，还是有学术意义的。我的那篇讨论此问题的文章，写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因看到《传记文学》上的争论，引起兴趣，就写了那篇文章。当时可供参考比较的材料毕竟很少，所以有些材料是不可靠的。

胡适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都太大，太重要了。因阁下以及比阁下更年轻一辈学者的

努力，胡适研究的材料更加翔博，思想更加深入。你们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工具都比我和我的同辈人先进多了，实在可喜可贺。

您个人给过我许多帮助，一直深心铭感。我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您的帮助。

文中有一处引文，可能引据的原书有失误。即《学刊》第 87 页第二个长段引文的第一行：“孟京虞、董姚皆作象，可证。”按，孟、京、虞、董、姚，应是指五位《易》学家。孟，是孟喜，京，是京房，两位都是汉代著名《易》学家。虞，是虞翻，是三国时期的《易》学家。董，是董仲舒，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汉代大经学家和《易》学家。唯姚是指哪一位，我暂时还不能确定，这需要查一查《易》学史方面的书，我手头没有这类的书，阁下若有兴趣，可查一查。

顺祝

研祺！

耿云志

2023. 12. 19.

收到耿先生的来信，我非常感动！对于晚辈提出的跟他相左的观点，耿先生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在信中处处加以鼓励，还反思了自己的观点，并帮我指出引据原书中的失误。孟、京、虞、董、姚五位《易》学家，经北大中文系王睿临博士协助查证，孟，是孟喜，京，是京房，二人是汉代《易》学家；虞，是虞翻，董，是董遇（并非耿先生信中提到的董仲舒），姚，是姚信，三人都是三国时期的《易》学家。耿先生不仅对我如此宽厚，对一些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他都是能帮助的帮助，不能直接帮助的，则经常加以鼓励。陈通造博士办了一个“胡适评论”公众号，一批年轻的朋友“用爱发电”，以整理、注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档案馆、台北胡适纪念馆藏的胡适未刊往来书信为主，我的研究生赵靖怡、马金叶也参与其中，做工最勤者要数北大中文系的夏寅博士和王睿临博士、台大中文系的介志尹博士、暨南大学文学学院的毛丹丹博士、陕西师

大教育学院的马文飞博士、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田俊先生等。耿先生尤其关注这个公众号，每次跟我提起时，都对年轻人的严谨学风和奉献精神赞誉有加。耿先生给晚辈写信，必称对方为“先生”，丝毫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有一次我跟他：“在您面前，我们都是后生，您还是叫我小席最亲切，您才是我们的先生！”耿先生则回复说：“我们还是要向前辈学习。胡适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和他们比，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耿先生的道德人品，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学习！用林建刚博士的话说：“先生晚年，心性文字，道德人品，越来越有胡适之风，越来越让人敬重。”（林建刚《“跟着事实与逻辑走”：悼念耿云志先生》）上面这封信，是耿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每念及此，不能不令我黯然神伤。

不久以后，耿先生又给我打来电话，我们谈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先生跟我聊起一段往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别人讲过，但我未曾在其他文章中读到过，因此我把这件事记录于此。胡适留在大陆的102箱材料，很长时间无人整理，上世纪70年代末李新先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曾聘请一位离休干部帮助整理胡适资料，耿先生告诉过我那位离休干部的名字，可惜我没记住。那位离休干部为了便于工作，就把胡适的一些材料带回家去整理，整理好一批，还回来，又带走一批。后来此人生病住院，不久就去世了，最后一批被他带回家的资料便不知所踪。耿先生说，他花大力气编42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是要对胡适资料做“抢救性保护”，若不抢救，不少资料很可能还会慢慢流失。他的很多书出版社都是赔钱的，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出版社却挣了大钱，而耿先生自己则一分钱没拿，所有版税都交给了近代史所。幸亏有耿先生对胡适资料的“抢救性保护”，耿先生去世的第二天，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孟华教授在朋友圈里说：“皇皇著述，裔裔功业，嘉惠学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何止是研究胡适的重要参考书，简直就是一座富矿！”

除胡适研究和胡适史料整理外，耿先生晚年

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成果、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八大册近470万字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2022年7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耿先生又一功垂千秋的工作。这套书出版后，耿先生就囑咐给我寄了一套，并希望我给这套书写一篇书评。这套书规模太大，装了整整一个纸箱，因家中书柜已满，无处摆放，我就把它放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每天去办公室阅读一点。不久后忽因疫情防控，无法出入校园，这套书便只好搁在办公室里赋闲，直到疫情解封后，我才得以继续阅读。然而还没读完两卷，学校又安排我来援疆，这类大套书籍不便携带，我又没能带来新疆。允诺耿先生的书评，至今还没有下文，这是我深感愧对耿先生的一件事。这套书出版后，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早就想开一个学术研讨会，也因疫情防控等问题一再延期。直到7月中旬，这个学术研讨会才终于得以召开，即本文开头所说的耿先生点名要我参加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与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而我却再一次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对于此事，我深感自责！一切理由都只是借口，如果疫情期间我不是把书放在学校，而是放在家里，如果我来新疆时带上这套书，也许书评早已写完；如果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所的会议我能调开时间回去参会，也许还能见上耿先生最后一面……如果，而今已没有如果！

耿先生的《胡适传》还没有写完，姗姗告诉我，先生已写到1946年。他在写作过程中，常托我帮他查找一些材料，或帮他查证一些信息。如2023年3月28日，他来信询问两个问题：“云舒先生：我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一、胡适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哈斯克讲座讲演《中国的文艺复兴》，后来大学用英文出版了这次的讲演。我想知道，那位为此书写序的Eustace Hydon当时是什么身份？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吗？二、我模糊记得好像见过一篇回忆胡适应邀做这次演讲有关情况的文章。但现在找不到这篇东西。我因为操作手机和电脑的技术都非常有限，往往不能及时保存材料。加之，记忆力又大减，所以常常要麻烦朋友

提供帮助。给您添麻烦，先致谢意！”我看到邮件后马上回复：“这位尤斯塔斯·海顿(Eustace Hydon)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系主任(1919—1945 年)，同时还担任哈斯克基金会的执行长。”关于回忆胡适应邀做这次演讲的文章，我帮他查找了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李书华《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里的相关记载。耿先生又让我找一篇邓嗣禹回忆胡适应邀到芝加哥大学演讲的文章，我找到后，耿先生发现原来自己“记忆有误，邓嗣禹回忆的是四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演讲的事”。2023 年 7 月 23 日，耿先生又给我一信：“云舒先生：今天翻看胡适日记，记他 1938 年 4 月 24 日去拜望从前的老师布尔教授。胡适记道：‘他以为历史上 toleration 比 rebellion 更重要。’后来胡适转述此意，表述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不懂英语，查一下词典，对胡适的转述是否完全符合布尔教授的原意，略生疑惑。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我阅信后，立即请我的研究生李亦冉同学把胡适日记、书信等各种材料中所有关于布尔教授这段话的记载全部摘录出来，最后确认布尔教授的原话是“容忍比反抗更重要”，胡适后来转述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显然含有特定时代环境下他自己的意图和发挥。除耿先生托我查找的资料外，我每次发现胡适的新材料，也会分享给先生。

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回忆起来，仿佛耿先生宽厚、慈祥的面容就在眼前。我不知道先生住在养老院的最后几年，有多少朋友和学生经常陪他说话，我虽在远，但或许我能有幸勉强算作其中一个。然而最近半年耿先生却没怎么跟我联系，听姗姗说，是因为弟子们劝他先做完自己的自编年谱和书信整理，先生暂时放下了《胡适传》的写作。耿先生的《胡适传》写到了 1946 年，即是说已经完成大半，可以想象已是一部皇皇巨著。而这一年胡适离美回国就任北大校长，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段落。从胡适一生的几个重要段落来看，耿先生的《胡适传》已具备一定的完整性，完全可以独立出版。我相信耿先生的《胡适传》必定是迄今为止最可靠、最扎实的一部胡适传记，因为没有人敢说自己比耿先生更熟悉胡适的史料，没有人能说自己对胡适的评价比耿先生更为客观。即便这部《胡适传》还有 16 年没有写完，它也仍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我期待有出版社能慧眼识珠，尽快出版耿先生的《胡适传》，因为它是凝结着耿先生毕生心血的著作。

最后，让我援引夏寅博士代“胡适评论”公众号全体同人拟的一副挽联作为本文的结束，这副挽联很好地概括了耿先生一生对于胡适研究的贡献：“辨冤白谤，表彰前贤求真史；发秘启藏，沾溉后学造新因”。

追忆耿云志先生

秦素银

2024 年 8 月 2 日，胡适研究群传来耿云志先生去世的消息，想起 7 月 6 日我和耿先生弟子宋广波老师、彭姗姗博士聚餐时问起耿先生的身体，姗姗还说耿先生每天可以接待访客，我就以为耿先生身体状况良好，谁知还不到一个月，突然传来耿先生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也非常难过。

耿先生是我认识的人中，极少数配被称为

“先生”的人之一，我一直以“耿先生”呼之。我于 2011 年认识耿先生，耿先生对于我服务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2014 年 7 月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合并，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工作一直给予大力支持，对我本人也给予诸多鼓励、关怀，我一直心存感激。

2011 年值逢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诞辰 120 周年，我馆计划联络台北胡适纪念馆

等单位联合举办胡适纪念展览，领导把与各方沟通联络、撰写展览大纲等工作交给了我。在阅读了几本胡适传记，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相关胡适收藏后，我完成了初步的展览大纲。在此之前，国内没有举办过胡适的展览，胡适又是相对有争议的人物，我对大纲内容非常没有把握，我馆馆长郭俊英女士嘱我联系耿云志先生，听听他的意见。此时的我对胡适一知半解，却要 and 国内最权威的胡适研究专家对话，忐忑之心可想而知。2011 年 1 月 19 日，我在做了一番心理建设后拨通了耿先生的电话，耿先生耐心地听我说完我们想举办胡适展览的想法以及展览的基本框架，言简意赅地对我予以了肯定，他说我确实是读了书，当时就决定邀请我参加当年 4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南京举办的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参会学者们当面交流。

这是我本人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不但了解了胡适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结识了不少胡适研究专家，对后来的胡适展览多有助益。比如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李又宁教授，听闻我们要举办胡适展览，当即表示要把珍藏的一件胡适手稿捐给我们。李教授言出必行，2011 年 10 月 8 日，我收到了李教授从美国寄来的胡适关于国际局势问题致蒋介石的“极密”长电手稿，为即将举办的胡适展览增加了一份珍贵展品并丰富了我馆的胡适收藏。此次结识的著名文史作家蔡登山，著有《何处寻找一一胡适的恋人与友人》，我曾向他请教与胡适发生情感纠葛的学生徐芳的生卒年。

之后我们继续修订展览大纲，并于 5 月 11 日召开了专家论证会。此次会议我们本拟邀请耿先生参加，但恰巧耿先生当日有事，耿先生推荐了他的学生宋广波老师与会。宋老师对展览大纲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并向我们提供了摄于 1935 年 6 月 9 日的胡适与安徽同乡合影一张。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由我馆与台北胡适纪念馆联合举办的“胡适文物图片展”终于在 2011 年 12 月 8 日上午隆重开幕，耿先生拨冗参加

了开幕式以及当天下午召开的“胡适与新文化运动”学术座谈会。耿先生在发言时说，他特别看重我们的会，为此想推掉前一天社科院举办的一个会，但院里说他一定得到，他才不得不参加。所以他谦虚地说，两个会议都没准备好，但还是兴致勃勃地讲了 30 分钟。耿先生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展览，认为展览办的非常成功，“比我预料的还要好”，有两点特别值得钦佩，一是因为这个展览什么人都可以看，什么人都可以看得懂，什么人都可以接受。哪怕你对胡适有很深的政治成见的人，他看这个展览也不会特别反感，因为那都是真实的东西。他认为胡适研究要从专家学者的圈子里面走出来，尽可能的让更多的群众知道胡适，了解胡适，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进步是很有意义的，展览在让群众了解胡适方面能起到学者们起不到的作用。二是这个展览不但是大陆的第一个胡适展览，而且还整合了大陆与台湾两方面的资源，今后恐怕在做胡适方面的工作，应该学习这个榜样，尽可能的把两岸的资源都动员起来，把胡适研究更往前推进一步。

2011 年 12 月 22 日，耿先生联系到我，让我把展览筹备、展览内容等写成文章发表在《胡适研究通讯》，让更多研究胡适的同好了解展览的情况。后我写成《〈胡适文物图片展〉开幕纪实》发表于《胡适研究通讯》2012 年第 1 期。

“胡适文物图片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两岸三地的媒体，包括北京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台湾《中华时报》、香港中通社等都对展览进行了报道。《中国文物报·博物馆周刊》还策划为此展览出一个专版，为此要采访胡适研究专家，我联系耿先生，他欣然接受了采访。耿先生的访谈以《寻求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为题被刊登在《中国文物报》2012 年 1 月 11 日第 5 版。

2012 年，我馆将“胡适文物图片展”先后送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巡展。我们还在原展览基础上进行调整，更名为“回眸胡适”，以图片展的形式在重庆、武汉及台湾地区展出，所到之处都引起热烈反响。想到耿先生的鼓励，我撰写了《让

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胡适——胡适展览回顾》一文向《胡适研究通讯》投稿，介绍胡适展览 2012 年的展出情况，被刊登在该刊 2013 年第 2 期。

为将展览成果固化下来，扩大展览的影响，我馆决定按照展览的叙事顺序，挖掘每个展品背后的故事，编撰成《寻找·发现·还原——胡适速写》一书。我们请耿先生为该书作序，耿先生再次欣然同意。当我冒冒失失在未给书稿的情况下向耿先生索取序言时，耿先生对我说：“你得把书稿给我啊，我看过才能写。”我惭愧不已。当我通过 Email 和耿先生谈起稿费时，耿先生于 2013 年 6 月 7 日给我回信说：

素银：

你好！

千万不要客气，我从来不在意稿费。特别是做胡适研究有关的事，我都是从责任心和使命感出发的。九十年代初期，我为了推动胡适研究，花了极大的气力把胡适档案彻底分类整理，然后编辑《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出版，曾给研究所增加三四十万的收入，我个人一分钱未拿。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序稿，我抽时间再琢磨一下。两日内当可发给你。

祝

顺利！

耿云志

这时我才知道耿先生编辑 42 册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么大的工程竟然分文未取，关于此事可能知道的人不多，特把耿先生的信刊布于此。

耿先生在《寻找·发现·还原——胡适速写·序》中再次肯定了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胡适”的宗旨，指出办展览、编写适合广大读者的普通读物是直接面向社会广大人群传播胡适的途径，因此“怀着充分的敬意”，向大家推荐“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朋友们所办的展览和他们所编写的这本书”。

2015 年 4 月，我馆举办了“旧邦新命——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展”，耿先生出席展览开幕式并致辞，可以致辞内容我没有记录下来。

自从得知我参与筹备胡适展览以来，耿先生就把我视为胡适研究圈的人，多次邀请我参加胡适研究会的活动，我有幸参加了该会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胡适逝世 50 周年座谈会、2013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学术年会、2015 年 7 月 20 日召开《胡适研究论丛》第三辑出版座谈会。耿先生还邀请我参加了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 2019 年 4 月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耿先生待人真诚可亲，虽然我无知少见，但每次与耿先生接触，总让我感到被尊重、被理解、被信任、被关怀。耿先生曾问过我一些小问题，如北大红楼有多少间房间？相机是选尼康还是佳能？不管我答复的好与不好，有无用处，耿先生总是真诚的表示感谢。有几次邀请耿先生参加我们的活动，耿先生因故不能参加，他都会详细说明原因并表示谢意。2016 年 12 月 18 日参加胡适会议，我上前和耿先生说话，耿先生说“我还在想怎么没看见你呢”，我何德何能居然被耿先生记挂着，特别温暖感动。2020 年 8 月间参加“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 105 周年研讨会”，是我和耿先生最后一次见面，耿先生和我说，常在朋友圈看到我的两个孩子，特别可爱。

2020 年 9 月 22 日，我在科学史研究群看到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樊洪业先生去世消息，因为知道耿先生与樊洪业先生相识，就把消息发给他。他很快回复说：“樊先生本是老朋友，1986 年在上海开会时相识。后来常有联系。十多年前，曾经参加我的一项课题的筹备工作，并推荐上海的张剑担当一项子课题，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最近几年联系较少。不想遽归道山。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学者，待人很诚恳。失掉这样一位朋友，令人殊深悼痛！”并嘱我将此段话转发到科学史研究群。看到耿先生如此重感情，我再看到老先生

去世的消息怕他难过就不敢发给他了。

有两件事我觉得对不住耿先生，一是耿先生曾经通过我向我馆提出两个建议，举办青少年胡适诗歌朗诵会与设法推动胡适在北京米粮库 4 号院的居所实现腾退保护，我因为自觉难度较大，没有向领导汇报。二是 2017 年 12 月 9 日，社科院近代史所举办“耿云志先生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暨耿先生八十祝寿会，邀请我参加，我因二宝是全母乳喂养无法走开，没

能参加这个会。当时我给耿先生发微信说，等他过九十岁生日时，我一定参加。之后我在心里一直默默祝愿耿先生健康长寿，好让我兑现承诺，却没想到耿先生会突然离世，成为我心里的一个遗憾。

印象中耿先生和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微笑着，天堂中没有病痛，耿先生可以永远微笑了。

2024 年 8 月 13 日

深切缅怀

我的小叔耿云志

耿凤文

我小叔出生在辽宁省海城牛庄，这是辽河边的一个小村庄。我父亲兄弟五人，小叔在家里排行老五。常听父亲说，小叔从小聪慧过人，他在不到四周岁时就能完整的数 100 个数了。

小叔年幼的时候就为人正直，敢想敢做，肯于独立思考，因而遇事往往有独立见解。他喜欢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本溪市一中读高中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题目是《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刊登在本溪市团的生活刊物上。当时文章发表以后，他的正确意见竟然引起了学校的争议，然后，在他的毕业鉴定中竟被扣上了自由主义的帽子！继而他受此影响，没能考入重点大学。

小叔一直心怀祖国和人民。1963 年寒假期间，小叔为家人和邻居叔伯们挥笔写了多副春联，记得有一副是这样说的：谊入一九六四年、神州六亿大团圆；东风化雨春光艳，一片瓞瓞花满园。1964 年，小叔大学毕业后即入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至今未变动。小叔一生秉持实是求事的思想原则，

为人谦虚、耿直，做事低调，从来不在晚辈面前谈论自己的工作成就。小叔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在晚辈面前从来都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关爱。在没有普及微信的年代里，我们经常互有书信联系。在大事面前，小叔一点不含糊，他经常鼓励我们要有家国情怀，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今年五月，为了给祖父母移坟，事前他积极联络，事先在墓前致辞。他的高风亮节令我们晚辈深深景仰。他病逝后，我们从他的学生、弟子口中又得到许多有关小叔嘉言懿行的信息，越发增添了我们对他的敬佩。他的病逝，使我们痛失了一位无比亲切的长辈和亲人。小叔知识渊博、才学过人、品德高尚，他的离世真可谓是：为国为民，一生耗心血；承上启下，精神留后人。

小叔您安息吧，我们晚辈永远怀念您！

姪女：耿凤文

2024 年 8 月 8 日于大连

从“人云”到“我云” ——耿云志先生的思想及其承诺

张宝明

如果说胡适研究一度是大忌，那么对几度风雨之后的学术对象来说，人云亦云则是研究的大忌。对胡适这样一个人的评价，在 20 世纪就经历了从“我的朋友胡适之”到“胡适之忏悔潮”。春去秋来，一时间拿胡适说事儿的“批判”文章犹如风卷残云，形成了前恭后倨之象。“这一个”的胡适，俨然是时代思想氛围的温度计或说晴雨表。曾几何时，用“人云亦云”作为学术上评判胡适的观念词似乎不算过分。从“我的朋友”之高枝攀附到趋之若鹜的纷纷远离，这一方面说明“胡适”作为符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喻示着学人们提笔弄文的不易。

撇开无奈、尴尬，胡适的形塑自然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毕竟，这关切到如何重建斯文的问题。这从思想史家耿云志的胡适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

我和耿云志先生的认识过程平平常常，没有更多的细节或轶闻要爆料。应该说，只是因为在自己的研学过程中多看了几眼他的胡适研究的“点”与“面”。至于之后在几次会议上的有所交集也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回想起来，我们个人的私下过往不算密切，甚至没有什么桥段可以大书特书。总之，一切都是学术上正常过往，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猛料值得披露和炫耀。我不得不承认，对耿公的外在一切我是模糊的。只是相形之下，我对其内在的思想及其承诺反而更为清晰些。正是在外在模糊与内在的清晰中，我才对耿公的为人为学有了几点忽隐忽现的记忆。

还在 70 年代的时候，耿先生从河南息县的“干校”抽调到北京开始了触摸胡适的工作。尽管那是处于搞“运动”的阶段，他还是在“运动”中走进了胡适的世界。从此，他以“一发而不可收”的心态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而且是一以贯

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这句话是耿公的夙愿，用今天的话是起初心，也是他毕生的承诺。

众人都在“皆醒”中运动“运动”，而他却“独醉”中“运动”胡适。心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意志，便开始了以柔韧而顽强的毅力创制一套精神体操的话语。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胡适研究并没有后来的氛围，有很多话语往往还属于只可意会的禁忌话题，用闻一多给新诗的规训说法即是“带着镣铐跳舞”。先生之所以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是因为他坚信：“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于是，重新发现胡适成为他殚精竭虑的努力方向。

记得卞之琳的《断章》曾这样写意：“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确，当我们在凝视高山或深渊的时候，高山或深渊其实也在凝视着我们。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正是在发现胡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耿公。

第一次见到耿公，大概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举办的思想史国际会议上。回想起来，应该是在烟台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耿公。因为年龄、身份等诸多原因，我们的见面既不能说一见如故，也不能说相谈甚欢。准确地说，这次见面不但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而是以并不愉快的学术歧见别过。事情的起因还在耿公“自将磨洗”的前贤胡适身上。当时，我在发言中借助陈独秀一通书信的解读给出了胡适入驻北大的单方面动因。

时过境迁，至今记忆犹新——

在接受蔡元培校长的委任状接人北大文科学

长之后，陈独秀得知胡适即将回国且举棋不定。于是，这位自视“神交”的文科学长便不失时机地致信那位海外游子说：“蔡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特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细读陈独秀 1916、1917 之年初岁尾写给同乡招揽信不难发现，求贤若渴的心情跃然纸上。虽然没有“煮酒”相论，但字里行间尤其是“神交颇契：已将”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的情分渲染到了极致。这里不但有“足下”是“编译之事”的“柱石”之内化于心的感情留人策略，而且还有外化于行的经济待遇。“月费至少可有百元”与“重要教授也有此数”以及“事畜之资可勿顾虑”的慷慨承诺，无不是胡适动心北大的动机。这里我过于强调了陈学长倚重蔡校长的急不可耐：在一副“不要陌生人说话”的情感留人、俸禄优裕的待遇留人的各种绑架中将一个海归延揽到麾下。耿公听了我的发言很是不以为然：“这样说，好像胡适是为了待遇才选择北大的。”我在回应环节还是固执陈独秀“悠悠我心”的心态，说：“耿先生，这则材料是我从您编选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读到的。这为我们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新青年》同仁的聚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也符合历史事实。这从后来胡适到北大任教后写给母亲的信中那句引以为荣的月薪炫耀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耿公以平和、淡定的态度微笑作答。

这一为人谦和、学术平等的态度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来说，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此后一段时间，我和耿公既没有电话联系，也没有书信往来，更么有今天所谓的“有组织的科研”。回想起来，生平中的第二次见面可能应该是在 2010 年中秋洛阳的“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

守”会议上。尽管思想史会议由我所任职的单位主办，但印象中似乎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忆，后来甚至怀疑耿公这样一位思想史大家是否真的大驾光临过。显而易见，一切的特殊接待和额外要求不曾发生。与其他学者一样，他在大会发言后就匆匆离开了。除却我们的不周，他为人谦恭、内敛与温和性情气质继续模糊着我的模糊。只是，他那极具洞见的犀利话语留在了十三朝古都上空：“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这是会议的主题，也构成了这一次学术讨论中的最强音。如同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主题歌，近代以来最激进与最保守的力量每每在强势、强权与强人的执掌中互位与循环。记得那时汶川地震刚刚发生，开幕式上为刚刚失去生命的芸芸众生哀悼的提议得到了先生的高度认可，会议在学术交锋与人文关怀中践行着思想的承诺。

与外在的低调形成鲜明的反差，耿公那内化于心的个性化淑世思想于我渐行渐近，愈见清晰。

最后一次见到耿公是在 2019 年的北京大学的那次五四思想史会议上。由于疫情以及年事等多方面原因，我们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鉴于这是第三次见面，我们便有了学术之外不多的寒暄。记得那时他当时刚才国外回来，一再说现在每出去一次开会都觉得特别累，他还用了“风烛残年”之类的话来形容自己的体力不支。虽则如此，他在会议上那个简短的致辞还是让我“耿耿于怀”、难以释念。在同仁尤其是年轻学者们对胡适等研究领域诸多无奈、几欲躺平的关口，他以胡适当年在“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的青岛讲话来鼓励青年才俊们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后来，我还专门让左玉河兄为我传来了先生的讲话原稿。文字不长，但意味深长，值得后学咀嚼品味。

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 2024 年 7 月。耿公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出版的座谈会在京举行。接到邹小站的通知，我本以为这次能够见到耿公，不料他却因为病魔缠身未能出席，我让彭姗姗转达了我的问候并表达有机会再去拜见。但这成了永久的遗憾。姗姗告诉我，8 月 2 日他们送

先生去八宝山时，雷鸣电闪、大雨滂沱。当我写这篇小文时，左玉河兄告诉我，先生的告别仪式将在 8 月 6 日举行。耿公身影，渐行渐远；耿公思想，渐行渐近。

“自将磨洗认前贤”。这是耿公一生一世的信仰定力，自带温和、悲悯而自由。用大概、可能、也许来描述对耿公的印象，以清晰、鲜明、深刻的几个片段打捞对先生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有一种力量叫坚守。从耿云志先生行走中，

我们所能汲取的正是他那从“人云”到“我云”的学术之道，尤其是由此而来的“言行不二，以言行事”之思想及其承诺。

任时光之匆匆，念思想之悠悠。以此送别耿公。

（作者系河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开沅先生：

久不见面了。忽接手书，为开故人。喜慰（至）。

梁景和同志到此来过，也还有其他同志来过台院。其人勤奋，再为写实；绝非虚出之士，信有可造之地。我本人对其志趣极表同情。但今年报名人数多，其中有一位山西师大 92 年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所以其他同志特我量其某之程度，故拟列入为第一候选人，另排在第 2 位。

院中尚未批示。待有结果再奉告。

先生此次归国，大约可摆脱一切纠缠，专心做学问和培养人才。我曾对朋友说，十余年来，在台培养人才不多，以开沅先生和陈旭麓先生最有成绩。我辈当效法。以后有机会甚想多的先生指导。如来北京，请打电话找我。我家电话 5013633，办公室电话 5255131 转 240。

时值盛夏，望多保重。即頌

时祺

耿云志 敬上 1984.7.2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 电话：中继线五五·五一三一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修订)

《胡适研究通讯》于2008年2月创刊，由于得到海内外学界朋友的大力支持，这个刊物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起到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的作用。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5万字左右，于每季度的第三个月（即每年的3、6、9、12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胡适研究会的内部刊物，供学会会员及相关学会间交流、阅看，非卖品。其电子版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网站上查阅。

《胡适研究通讯》自2013年第3期（总第23期）起，向作者致送稿酬。作者来稿，于一个月内决定是否采用；凡决定采用的稿件，即通知作者，此稿即不宜再投给别处。凡一个月后仍未得到通知的作者，其稿作者自由处理。

凡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本《通讯》不再刊登。

《胡适研究通讯》发表的文章，文责由作者自负；本《通讯》由宋广波主编。

《胡适研究通讯》是为从事胡适研究的朋友们以及对胡适有兴趣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投稿邮箱：hushi620224@126.com